臺大歷史學報第 39 期
2007 年 6 月，頁 1~75

BIBLID1012-8514(2007)39 p.1-75
2007.1.23 收稿，2007.4.20 通過刊登

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

許　雪　姬**

提　要

楊雲萍教授（1906~2000）在臺大歷史系任教長達四十年，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院校開授臺灣史課程的人。他醉心文學，本非歷史系出身，但卻上承連雅堂、林獻堂兩人的史學，下開解嚴前後臺灣史研究的風氣，楊氏的歷史地位有其時代背景。

日本統治臺灣後期已進入戰爭體制，臺灣原是帝國的邊陲，卻必須支援戰爭，甚至淪為戰場。身為臺灣人的楊雲萍，既不能積極協助戰爭，也不能出面反對戰爭，沉潛於鄉土研究，是他在戰爭中找到的出路。不僅如此，他還在《臺灣日日新報》撰文呼籲臺北帝大非得研究臺灣不可。

戰後他投入報界，為文針砭時局，積極呼籲奪還語言、修纂臺灣史；擔任臺灣省編譯館的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積極從事相關研究。二二八事件後，編譯館關閉，乃入臺大歷史系任教，曾開「南明史」、「臺灣史」、「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等課，並指導研究臺灣史的博、碩士生完成論文。

《臺灣史上的人物》、《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是其重要著作。研究古典詩人的詩作與生平、客觀地評論歷史人物，是他對臺灣史最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楊雲萍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臺灣省編譯館　臺灣史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二十世紀後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2006 年 12 月 15、16 日）。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臺灣史研究的開端
三、在臺大的教授生涯
四、對臺灣歷史研究的貢獻
五、結論

一、前言

楊雲萍教授（1906~2000），本名楊友濂，被譽為「史學與文學雙棲才子」，並以「詩人楊雲萍、史家楊雲萍」著稱。[1]臺北士林人，自幼奠下深厚之國學基礎；1921 年考上臺北一中，不久即開始寫作；1925 年，與江夢筆（臺灣在住華僑）創刊第一本臺灣白話文學雜誌《人人》；1926 年，入日本大學就讀，而後入大學院。1933 年返臺，逐漸投入南明史、臺灣史、臺灣民俗的研究領域。戰後，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聘為參議；又入臺灣省編譯館任編纂兼第四組組長，進行臺灣史料刊印、臺灣史研究等工作，惜該館於 1947 年 5 月被裁撤。同年 8 月，在原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推薦下，入臺大歷史系任職；9 月開授「臺灣史」課程，一直到 1978 年，這門課才交由黃富三教授繼承。而他的同僚，來自浙江的方豪（杰人，1910~1980）教授，自 1975 年起開「臺灣史專題研究」，才稍打破他在臺大獨領臺灣史風騷將近三十年歲月的情況。楊雲萍前後在臺大開過「臺灣史」、「明史」、「日人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南明史」、「歷史哲學」等課，並完成《臺灣史上的人物》、《臺灣的文化與文獻》、《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由張炎憲編輯）三本書，均為重要的臺灣史著。此外，他參與日治時期《臺灣民俗》的編輯、撰稿，戰後主編《臺灣風物》前二卷，還擁有豐富的收藏

1 黃富三，〈孤傲的智者：史學與文學雙棲才子楊雲萍教授傳略〉，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品留給後世，如歌仔冊、羅馬白話字印刷品、契字古文書、名人筆迹等，目前分別收藏在臺灣大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楊雲萍教授（以下省略頭銜、敬稱）的研究，以研究其文學活動或作品為多，如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2]林瑞明〈《山河》初探：楊雲萍詩論之一〉，[3]葉石濤〈楊雲萍與《人人雜誌》〉，[4]其他臺灣文學史相關專著，亦不乏對楊雲萍的評價。但有關其史學，尤其是臺灣史方面的研究，則除林瑞明〈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黃富三〈孤傲的智者：史學與文學雙棲才子楊雲萍教授傳略〉與拙著〈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之外，[5]尚少人觸及。主要原因是近一、二十年來，比起臺灣歷史的研究，臺灣文學不但走在前端，且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年輕學子的熱心投入，使四所大學成立臺灣文學系，臺灣文學所（包括博士班）則有七個之多。[6]做為懂得新、舊文學，[7]且本身是創作者的楊雲萍，自然是重要的研究對象。楊

2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2），共280頁，此為其碩士論文改寫。

3 林瑞明，〈《山河》初探：楊雲萍詩論之一〉，收入氏著，《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臺北：允晨文化，1996），254~264。

4 葉石濤，〈楊雲萍與《人人雜誌》〉，收入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著，《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5 林瑞明，〈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發表於「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學術研討會」（臺北：國史館，2001），後刊於《文學臺灣》45期（2003，高雄）；黃富三，〈孤傲的智者：史學與文學雙棲才子楊雲萍教授傳略〉，《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85~95；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卷1期（2006，臺北），110~151。

6 截至2006年底為止，臺灣公私立大學之臺灣文史系所共有23所，其中大半為語言、文學、文化系所。此外，尚有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暨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以「臺灣歷史」為名設所的只有師大、政大兩所國立大學，成立於2004年（政大臺史所博士班於2006年正式核准成立），皆尚未有畢業生。以此相比，即知臺灣歷史的研究遠不如臺灣文學的研究。

7 楊雲萍除創《人人》、寫小說外，其實國學底子很強，原有《吟草集》等舊詩創作想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雲萍的人生歷程可用文學和史學來加以區隔，戰前他是文學家，愈到後期，因戰爭思想統制所致，而漸走入民俗、歷史的研究；戰後基於對臺灣未來的關心，他投入第一線做為新聞人，寫社論、評論，而後走向民俗、歷史之路，成為史學家。[8]

當他成為史學研究者後，面臨的是戰後臺灣史研究的倒退、「臺灣史」尚未形成一門學問、研究人材不多的窘境，因此他除了致力於培育下一代的研究者外，並未寫出如同輩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1979）、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1981）等傳世之作，[9]但他所著《臺灣史上的人物》，[10]已見其史學功力。本文旨在探討臺灣史研究開其端緒後，楊雲萍在臺灣史研究的貢獻，在臺灣史研究上的角色與地位，以及他對臺灣史研究的特殊見解，最後敘及他為後來的臺灣史研究者留下那些遺產。

有關楊雲萍重要的史學、文學及相關作品，都在文建會 2001~2004 年「《楊雲萍全集》編譯、出版計畫」[11]下收錄完備，本人為該計畫的協同主持人，故得以使用相關資料。又在國家數位典藏計畫項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將楊雲萍相關書信予以數位化，並正在建立「楊雲萍資料庫」，本人為該計畫主持人，負責書信整理、判讀、解讀工作，因此

出刊，只是要讓讀者瞭解他之反對舊詩、舊文學，並不是不懂舊文學、不會寫作舊文學，而是舊文學已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其舊學也頗得連雅堂贊許。見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收在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721~724；此文原刊於《臺北文物》3 卷 2 期（1954，臺北），50~56。

8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83。

9 戴炎輝生卒年：1909~1992；陳紹馨生卒年：1906~1966；與楊雲萍可算同時代的人。

10 楊雲萍，《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此書內容為楊氏 1952 年起在《中華日報》連載的文章，共有 120 個臺灣人物；1981 年，成文書局為之編輯成書，加上〈《人人雜誌》創刊前後〉、〈蔣渭水先生之追憶〉、〈楊爾康先生遺著〉、〈「溪山煙雨樓詩存」序〉四篇相關之作。

11 此計畫分兩個階段進行，先由行政院文建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委託成大歷史系執行，由該系教授林瑞明任主持人；第二階段則由臺灣文學館委託，由於林瑞明任該館館長，又不能不再由成大歷史系接辦（因兩個計畫具延續性），因此商請鄭梓教授為主持人，由筆者以協同主持人的身分來進行這個計畫，相關作品目前尚未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能利用相關一手史料，[12]謹對參與這兩項計畫的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助理致謝。

二、臺灣史研究的開端

（一）臺灣讀書人「歷史」意識的出現

根據臺大歷史系吳密察教授的研究，清代幾乎沒有臺灣人曾以臺灣為對象，進行可稱之為歷史的撰作；若有，則為鄭用錫（1788~1858）的《淡水廳志稿》。此外，大抵不出編寫族譜或詩集的範圍，且以手稿存在的形式居多。但 1895 年臺灣割讓，對臺灣的知識分子而言，是極大的挫敗，因此觸發他們從事歷史寫作，將面臨鉅變時，「孰為奮勇抗戰，孰為不戰而走」清楚地記下來，歷史意識被激發出來。不少記載割讓當時歷史的書陸續出版，如思痛子《臺海思慟錄》（1896）、吳德功（1850~1924）《讓臺記》（1897）、洪棄生（1867~1929）《瀛海偕亡記》（1906）、《寄鶴齋選集》（1895 前後完成）。[13]有了這些史料，二十年後即產生臺灣第一位史家連雅堂（1876~1936），他的大著《臺灣通史》雖然錯誤不少，[14]卻是臺灣人自己所寫的第一本通史，就臺灣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他是第一個必須被標舉的人物。

日本治臺期間，不少史家勤於翻譯臺灣相關史料、寫作史著，使臺灣史研究的質、量提高許多。當中如百科全書派的伊能嘉矩（1867~1925）《臺灣文化誌》三大冊，村上直次郎（1868~1966）研究荷蘭時代的臺灣史，譯註《巴達維亞城日記》，早已膾炙人口，惟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

---

12 此計畫於 2003 年開始進行，筆者為主持人，將楊雲萍手劄、書信數位化，並進行資料庫的建立工作，未來五年內一定會完成。資料庫中收有大事紀、年表、楊黃月裡女士（楊雲萍妻）的訪問紀錄、書信、評傳等。

13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入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4~20。

14 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連雅堂之後，如以狹義的看法來說，有史著的就只有林獻堂（1881~1956）和楊雲萍了。連雅堂和林獻堂兩堂都是學有根柢的文人，做為一個「不可不知臺灣事」的臺灣人，連雅堂寫下了《臺灣通史》；而林獻堂則與傅錫祺（1872~1946）合作完成了《櫟社沿革志略》、《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與其子林猶龍（1902~1955）合作《坑口農事自治村事業概況》，並為《林氏家傳》撰稿，編《林氏宗譜》、《林氏家譜》，為當代保留了不少資料。楊雲萍與兩堂皆有深厚交情，也繼承了兩人的歷史事業。[15]

在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到底有沒有臺籍人士從事臺灣史研究？如果將「歷史」做狹義的定義，則幾無一人，而在島內、島外大學培養出來的史學人材也不多。就島外來說，陳荊和（1917~1995）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他是臺中醫生陳茂堤（1893~?）的長子，畢業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科，專攻越南史；曾任臺大歷史系講師（1946.12~1950.8）、副教授（1950~1960，1958 赴越南，二年後正式辭職），1963 年後長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16]第二位為陳華宗（1903~1968），畢業於日本立正大學史科，其後在該所任副手，鑽研史學，而後任教神奈川縣中原高等女學校；1932 年回臺，除協助家業外，也為研究臺灣史而奔走全臺，[17]但遺憾地並未見到其相關史著。

創立於 1928 年的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又為臺灣史研究培養過什麼人材？如依同學錄看來，戰前共有 14 屆畢業生。[18]除 1952 年以前即過世而不詳其科別外，將「史學」科的畢業生依序臚列於下：

柯設偕（1900~1990），臺北縣，第一屆（1931 年 3 月畢業），學位論文為〈台灣の名稱の歷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台灣に関する知識の變遷〉。

張樑標（生卒年不詳），彰化市，第三屆（1933 年 3 月畢業），其

15 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卷 1 期，109~151。

16 杜淑純，《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153；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79~80。

17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245。

18 第 14 屆為 1943 年 9 月畢業者，15 屆沒有人畢業，16 屆為 1945 年 9 月畢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位論文為〈第十六七世紀に於ける南支と南洋の歷史的関係〉。[19]

柯、張二人是畢業 45 人中，唯二的歷史科班生，但他們並未走上研究歷史之路。[20]

（二）初期的臺灣史著

楊雲萍於 1931 年自日本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畢業後，有兩年的時間在東京鬻文，之後於 1933 年 4 月回到臺灣。他在〈東京別三弟〉一詩中透露出回臺的原因是「文章無人買」。[21]回臺後，他致力於讀書，將近一年才在《先發部隊》創刊號發表〈斷章〉一文。[22]如果要說他的史學（或學術）之作，廣義而言，第一篇是〈芝山巖考〉；[23]他所期許的臺灣研究，則由〈臺大と臺灣の研究〉一文可知。[24]

從 1937 年起到 1945 年戰爭結束止，史學家楊雲萍的面貌已漸漸形成，這八年他所發表的學術性文章，有以下幾種類別：

1. 考訂：如〈芝山巖考〉、〈楊浚は楊承藩にあらず〉。[25]

---

19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臺北），85~89。

20 臺大同學會編，《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同學會，1952），1~4。柯設偕曾任淡江中學教師、校長。張樑標曾在臺灣省編譯館協助翻譯國分直一的研究成果〈苑裡後龍舊新石器時代遺跡發掘預報〉、〈臺北盆地之農業〉；幫池田敏雄譯〈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幫淺井惠倫譯〈Utrecht 大學所藏平埔族蕃語彙〉。見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73。張樑標後成為農林廳主計專員。

21 該詩發表於《民報》，1945 年 11 月 8 日，（二）。林春蘭仍主張楊雲萍在 1932 年東裝回臺灣。林春蘭，〈楊雲萍年表〉，《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219。

22 林瑞明主持，許雪姬協同主持，〈楊雲萍著作目錄初編〉，收在〈《楊雲萍全集》整理編輯計畫期末報告書〉（臺南：未刊稿，2001），2。《先發部隊》於 1934 年 7 月創刊，是臺灣文藝協會主辦的白話文雜誌，由廖漢臣編輯，只發行一號，第二號就改為《第一線》。楊雲萍收藏了創刊號。

23 楊雲萍，〈芝山巖考〉，《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4 月 13 日。該文考訂「巖」字代表寺，故芝山巖即芝山寺，是建在芝山上的廟之意，而芝山應念成 chi san；並引經據典，反駁《淡水廳志》有關惠濟宮記載的錯誤。

24 楊雲萍，〈臺大と臺灣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15~17 日。

25 楊雲萍，〈楊浚は楊承藩にあらず〉，《文藝臺灣》第 3 號（1940 年 5 月），154~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詩人及其作品評介：如〈「劍花室文集」に就いて（連雅堂の遺墨）〉，[26]又如〈劉家謀の「海音」に就いて〉。[27]
3. 史料翻譯、解題：這一部分所占比例最高，如在《臺灣公論》連載江日昇的《臺灣外紀》日譯；[28]在《民俗臺灣》以「臺灣關係文獻解題」陸續介紹《漢和洋書對照臺灣年月誌》、[29]〈基滬獲勝保獎各案清冊〉、〈海外異傳匡謬〉、[30]《南洋拓殖列傳》、[31]*The Middle Kingdom*、[32]《臺灣進退志》、[33]《海國聞見錄》[34]等。

---

26 楊雲萍，〈「劍花室文集」に就て（連雅堂の遺墨）〉，《臺灣時報》第 268 號（1942 年 4 月 15 日），84~92。

27 楊雲萍，〈劉家謀の「海音」に就いて〉，《文藝臺灣》1 卷 2 號（1940 年 3 月），80~87。

28 《臺灣公論》8 卷 3 期（1943 年 5 月號）；8 卷 4 期（1943 年 7 月號）。

29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漢和洋書對照臺灣年月誌》〉，《民俗臺灣》3 卷 4 號，總卷第 22 號（1943 年 4 月，臺北；以下各期《民俗臺灣》出刊地均為臺北，不另註出），15。本書為號稱「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的高田雄種所編之手稿本，主要是將中、日、外文有關臺灣的記載摘要翻譯（洋書）而照年月日順序排出，起自 1440 年迄 1885 年，自 1924 年 11 月 20 日開始編，但尚未完成。本文除介紹內容外，也不忘匡正翻譯的錯誤。

30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基滬獲勝保獎各案清冊》、《海外異傳匡謬》〉，《民俗臺灣》3 卷 5 號，總卷第 23 號（1943 年 5 月），14~15。此〈基滬獲勝保獎各案清冊〉為福建省會善後總局錄送，若對照〔清〕劉銘傳，《劉壯肅公（省三）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則彼此顯然有參差之處。至於〈海外異傳匡謬〉，乃「無名陳人」（小林道隆）批駁齋藤正謙《海外異傳》中對鄭成功撰述不確之處。

31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南洋拓殖列傳》〉，《民俗臺灣》3 卷 6 號，總卷第 24 號（1943 年 6 月），11。《南洋拓殖列傳》為連雅堂所撰。

32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The Middle Kingdom*〉，《民俗臺灣》3 卷 7 號，總卷第 25 號（1943 年 7 月），7。這本由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 1884）所寫有關中國的著作，1883 年出版時，在歐洲洛陽紙貴。書中有關臺灣的，如上冊第 2 章有"position, inhabitants, and productions of Formosa"、"The Pescadore Islands"，下冊第 26 章，卷末附有 Bibliography of Formosa，著錄一些書中所沒有的資料。

33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臺灣進退志》〉，《民俗臺灣》3 卷 8 號，總卷第 26 號（1943 年 8 月），25。此書為吳大廷所輯，紀錄他在 1876 年任臺灣道到 1878 年離職之間的始末。其中有左宗棠推薦的奏章、吳大廷的辭職稟申及上官慰留之文，書前有楊希閔的序。

34 楊雲萍，〈臺灣關係文獻解題——《海國聞見錄》〉，《民俗臺灣》4 卷 4 號，總卷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人物介紹：如〈臺灣研究の碩學——伊能嘉矩〉、[35]〈一つの追憶〉（回憶連雅堂）。[36]
5. 書的評介：如陳逢源（1893~1982）《雨窓墨滴》，[37]及批評黃得時（1909~1999）的〈糊と鋏と面の皮：黃得時氏「臺灣文學史序說」を讀む〉。[38]
6. 文學民俗研究：如〈臺灣文學の研究〉、[39]〈福州歌謠偶記——魏應麒編の福州歌謠甲集に就いて〉。[40]

上述的作品可說是楊雲萍史學進程的第一步，如依著作目錄加以分析，不論文章長短，都具有一定的問題意識，配合著時局而做。舉〈「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と其他〉（「巴克禮博士的風貌」及其他）一文為例，這篇文章其實是評介井川直衛編的《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一書，其中國府種武寫的〈トマス：バアクレイ師と國語教授〉一文。最主要是針對日本即將在 1937 年 4 月 1 日（一般報紙）、6 月 1 日（《臺灣新民報》）廢除漢文欄，故藉著羅馬字教化論者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的傳中，談及巴克禮直接讓英國傳教士學臺語，因為漢字太難，他自己也是個漢字學者，故更確信羅馬字教化論的無誤。

---

34 號（1944 年 4 月）。《海國聞見錄》為陳倫炯所著。

35 楊雲萍，〈臺灣研究の碩學——伊能嘉矩〉，《臺灣時報》253 號（1941 年 1 月），73~77。

36 楊雲萍，〈一つの追憶〉，《愛書》第 10 輯（1938 年 4 月），此為追憶連雅堂，於連氏逝世一年餘時所作。文中抄寫連震東當時所發的喪報，還有張繼寫給連雅堂兩信，信乃謝連雅堂贈《臺灣詩薈》、《臺灣通史》之事。

37 楊雲萍，〈陳逢源著《雨窓墨滴》〉，《民俗臺灣》2 卷 11 號，總卷第 17 號（1942 年 11 月），38。《雨窓墨滴》為當時任《興南新聞》經濟部長的陳逢源所著，收羅著作二十多篇，以感想、隨筆、紀行文為多。其中〈忘卻されたる臺灣研究〉一篇，楊氏頗有同感，特別請讀者別忘了作者的言論。戰後《雨窓墨滴》重印，由楊雲萍寫序。

38 楊雲萍，〈糊と鋏と面の皮：黃得時氏「臺灣文學史序說」を讀む〉，《文藝臺灣》6 卷 5 號（1943 年 9 月），主要批評黃得時刊於《臺灣文學》3 卷 3 號（1943 年 7 月 30 日），卷首的〈臺灣文學史序說〉，是剪刀和漿糊剪貼出來的，措詞犀利，指證歷歷。

39 楊雲萍，〈臺灣文學の研究〉，《臺灣藝術》1 卷 3 號（1940 年 5 月）。

40 楊雲萍，〈福州歌謠偶記——魏應麒編の福州歌謠甲集に就いて〉，《臺灣時報》259 號（1941 年 7 月），60~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當時卻要廢漢文，並不是漢文難，而是因為「臺語發音的漢文所以才不好」；又諷刺說：「不久必須以萬葉音讀『陳三五娘』和『三〔山〕伯英臺』歌的時候將要到來吧！真是文化大大地進步了。」文末且諷刺作者井川，強說巴克禮主張「羅馬字教化論並不意味及於學校教育」，實為配合政府政策而做的斷章取義。[41]

〈臺大と臺灣の研究〉一文也值得注意，這篇文章分上、中、下連載於 1939 年 2 月 15 至 17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主要針對前一年帝大的《帝國大學新聞》中提及文政學部的畢業生難以就職，且志願入學的學生少，而形成文政學部存廢的討論。楊氏認為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沒有如朝鮮京城大學發展出教學、研究的特色，[42]臺北帝大的特色應該以研究臺灣為主，因此他給臺大文政學部建議，如果臺北帝大非得研究臺灣不可，那麼應該設如下講座：（1）臺灣史講座、（2）臺灣文學講座、（3）廈門語講座。這三部分可以說仍是目前研究臺灣文化的三大重點，而臺大卻一直要到他在戰後任教於歷史系，才在 1947 年 9 月開設「臺灣史」。

他在文中指出，過去研究臺灣史的有連雅堂、伊能嘉矩、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禮密臣（或譯戴維生，James W. Davidson，1872~1933）。但要有體系地研究臺灣史，設此講座時不妨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荷蘭時代；二是鄭氏以後。至於臺灣文學則是先人研究業績最少的一部分，必須開拓此一分野。研究廈門語，即研究廈門音系中的福佬話，是比較流行、普遍的，此研究具有實用性。[43]後兩者在

41 楊雲萍，〈「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と其他〉，《臺灣新文學》（4、5 月號合刊本），2 卷 4 號（1937 年 5 月）。見〔日〕井川直衛，《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臺南：基督教真理社，1936），64~75。

42 京城帝大在創設之初以朝鮮為研究中心，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逐漸轉移到中國東北、內蒙，即所謂「滿蒙」研究。見〔韓〕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學に見る——戰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國家〉（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1995）；〔韓〕朴光賢（Pak Kuan-Hyon），〈京城帝國大學と「朝鮮學」〉（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

43 楊雲萍，〈臺大と臺灣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15~1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戰後臺灣的學術殿堂要到八〇年代以後才露出研究的曙光。

總之，戰前楊雲萍對臺灣研究持續關注，他評論史著、介紹詩人的生平、著作，介紹史料，為文提倡臺灣研究，和前輩林獻堂、陳逢源對臺灣研究的身體力行與呼籲，在當時島內係屬先知先覺者。他在 1941 年發表的〈士林文化展出品の臺灣研究必讀十書〉一文，[44]已為自己闢出一條研究臺灣史之路。

（三）加入《民俗臺灣》撰稿群

楊雲萍 1933 年回臺到終戰期間，經常為文投稿於《臺灣日日新報》、《文藝臺灣》、《臺灣藝術》、《臺灣時報》、《民俗臺灣》、《新建設》、《旬刊臺新》等雜誌、報刊，[45]其中以加入《民俗臺灣》的撰稿群最為重要。當日本統治當局開始廢除報紙的漢文欄，積極進行皇民化運動，臺灣人知識分子如楊雲萍者流，具有族群文化被消滅的危機感。這時正有臺北帝大教授金關丈夫（1897~1983）等人出而創辦《民俗臺灣》，由於該刊〈趣意書〉（發刊辭）中先肯定日人皇民化政策，再說明很可能在皇民化運動中破壞了原無弊害的舊慣，因此文明國民有義務加以記錄。[46]《民俗臺灣》究竟抱持什麼立場，令人既好奇又疑惑。

楊雲萍立即針對《民俗臺灣》的研究態度與立場提出了強烈質疑，他選擇在臺灣總督府機關報《臺灣日日新報》發表〈研究と愛〉[47]一文。文中首先抨擊不懂臺灣話、白話文的人卻可以論斷白話文之作品大都是模仿（這當然指的是島田謹二〔1901~1993〕）；[48]其次，指出以研究「臺

44 楊雲萍，〈士林文化展出品の臺灣研究必讀十書〉，《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24 日。

45 除上述雜誌外，還有《興南新聞》、《臺灣地方行政》等；《新建設》為皇民奉公會的機關報。

46 〈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統る論評の始末（上）《民俗臺灣》發刊に際して〉，《民俗臺灣》1 卷 2 號，總卷第 2 號（1941，臺北），42。

47 楊雲萍，〈研究と愛〉，《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5 月 29 日；同時載於《民俗臺灣》1 卷 2 號，43。

48 主要是對島田謹二無視 1920 年代臺灣白話文新文學運動成果的反駁，見林春蘭，《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慣習」自居，卻揚言「不惜其湮滅者」，希望這些「學者專家，多抱持溫暖的理解、愛心與謙遜的美德」。楊之所以如此，應該是對日本學者將研究臺灣人的慣習視為「民族學」，而非「民俗學」，且對皇民化運動下，要「不惜湮滅」臺灣的民俗舊慣，感到疑慮。此外，做為研究臺灣的人，很難容忍研究臺灣民俗的雜誌，參與發起的臺灣人只有黃得時、陳紹馨而沒有他。[49]

金關丈夫做為一個自然科學者領銜寫的〈趣意書〉，自然有義務在同報刊出〈民俗への愛〉，[50]做為回應。他指出「不惜其湮滅」是指民俗要有更積極的意義，不止在防止舊慣的湮滅，同時更強調「對於臺灣民眾的愛，理解民俗的熱誠，我等決不落後人」；另也指出，《民俗臺灣》的發刊，正是在糾合對臺灣民俗關心及有興趣者，以孕育出真正的研究者，同時也答覆說這方面的研究更非「本島人」（臺灣人）不可。

金關等人對於意料外的直擊，倒也立刻反省、自圓其說，同時也只能將他們在日本當局積極推行皇民化之際，不得不審慎擬定趣意書的「委屈」吞入腹內，也給予想要投入《民俗臺灣》的「本島人」肯定的邀稿意象。得到回應的楊雲萍，雖然覺得在理智上可以接受，但仍得理不饒人，又在同報 6 月 15 日再說明，民俗除了研究外，對於即將湮滅者也該「抱著憐惜與愛惜之心才是」。[51]此一有關臺灣民俗研究的論戰，《民俗臺灣》十分重視，將〈研究と愛〉以及〈文脈と語氣：金關丈夫先生に答ふ〉，放入 2、3 號，同時冠以〈論爭の始末〉。[52]此舉除了將

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27；島田謹二戰前是臺北高等學校教授、臺北帝國大學講師，他有關臺灣文學的研究論著，發表於《臺灣時報》及《臺大文學》（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雜誌）者，將近有 20 篇；戰後也在《文學》（岩波書店出版，尾崎秀樹編）發表數篇論文，1971 年修訂上述稿件出版《舊植民地文學の研究》（勁草書房）。見〔日〕河原功，〈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收入氏著，《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123。

49 此外為國分直一、岡田謙、須藤利一、萬造寺龍（工藝指導家）等日籍學者。

50 楊雲萍，〈民俗への愛〉，《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6 月 1 日。

51 楊雲萍，〈文脈と語氣　金關丈夫先生に答ふ〉，《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6 月 15 日。

52 楊雲萍對金關丈夫於 1941 年 5 月《民俗臺灣》即將出刊之際，發給各界的〈趣意書〉有意見，立刻在 5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學藝欄發表〈研究と愛〉一文，編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關和楊兩人的觀點論辯清楚，事實上也藉此揭示了這些日本學者有意願和「本島人」共同擔任臺灣民俗研究的工作，同時也向有志於此的本島人、日本人徵稿，以壯大陣容。

此後楊雲萍接到主編之一池田敏雄（1916~1981）的邀稿函，因此在《民俗臺灣》第 1 卷 4 號發表第一篇文章：〈排算八字と析字法〉，[53]而後該刊成為他戰爭時期最重要的投稿對象，也和金關丈夫、[54]立石鐵臣（1905~1980）、[55]池田敏雄[56]三人成為文友，甚至有很深的私交。楊雲萍的這段參與，就成為往後他投入《臺灣風物》編輯的珍貴經驗。此外，陳紹馨、黃得時等臺人的加入，也使得《民俗臺灣》更像「臺灣人間」（臺灣人）的雜誌。

《民俗臺灣》第 1 卷第 6 號「士林特輯號」，第一次展現楊雲萍的鄉土史研究及其臺灣史研究功力。他在籌劃此專輯時，先在《臺灣日日

人池田敏雄在《民俗臺灣》第 2、第 3 號特闢「論諍」一欄，刊出〈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繞る論諍の始末（上）《民俗臺灣》發刊に際して〉，再刊出金關丈夫的回答〈民俗への愛　楊雲萍君に答ふ〉（頁 42~45），第 3 號刊出（下），由楊雲萍再回應金關丈夫〈文脈と語氣　金關丈夫先生に答ふ〉，頁 39~41。亦可參看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50~52。

53 除了上述的論爭外，第一篇文章是第 1 卷第 4 號的〈排算八字と析字法〉，本文旨在說明排算八字和析字法並不同，指出島山喜一在《東方文化史叢書》所刊載的〈太平天國亂的本質〉一文中的失誤。該文並引用了發行在 1936 年的《看命相褒歌》，可知楊雲萍已開始搜集歌仔冊。

54 金關丈夫於 1943 年出版《胡人の匂》一書，楊雲萍在「點心」欄（《民俗臺灣》第 7 號）刊出對本書的推崇，但曾在信中推崇過這書為「名著」的楊雲萍，卻接受金關的建議將「名著」兩字刪除。見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卷 1 期，148。今存金關寫給楊雲萍的書信 10 封、明信片 14 張，藏於中央研究院臺史所。金關過世後，楊曾在《えとのす》寫〈金関丈夫先生の思い出〉一文，認為《民俗臺灣》的創刊是日本人的真勇氣和良心的表現，而金關等人在日本人當中是有正義感和學術良心的。文見《えとのす》12 號（1983，東京）。

55 立石鐵臣寫給楊雲萍的信 5 封、明信片 5 張，立石曾為楊繪「外雙溪習靜樓」（油畫）。

56 池田敏雄給楊雲萍的信 7 封、明信片 43 封、電報一通，為其妻池田（黃）鳳姿寫的明信片 2 封。池田過世，在臺曾開追悼會，楊雲萍也參加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報》發表〈士林文化展出品の臺灣研究必讀十書〉一文，[57]這十本書是《臺灣通史》、《臺灣文化志》、《臺灣府志》、《諸羅縣志》、《淡水廳志》、《臺海使槎錄》、《臺灣外記》、*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治下的臺灣》）、*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臺灣島之過去與現在》）、*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臺灣島史》）。戰後以中文再寫的〈臺灣研究必讀書十本〉，連載於〈臺灣風土〉。同在臺大任教的方豪教授曾告訴筆者，他開始研究臺灣史，乃因閱讀楊雲萍在〈臺灣風土〉所刊之介紹，進而借閱那些書，才踏入研究臺灣史之路。

他首先在「士林特輯號」卷頭語中以〈研究と對象〉，指出：研究並不會因對象而有價值大小、高低之分。因為研究的對象是塊稀世的寶石，所以其研究的價值就既大又高；因為研究的對象是到處都是的土塊，所以其研究的價值就又小且低的，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不用說，因為對象的不同，所以研究的手段和技術也有所差異，然那終究只止於手段和技術。更進一步的說，因為無論哪種對象，都可以藉由研究它而發現學問的真理之故。接著他引了 Alfred Tennyson（1809~1892）於 1870 年所寫的詩"The Holy Grail and Other Poems"，對臺灣研究做以下感歎：

> 哀哉！如同在有裂縫的殘壁間發現小花似的，究竟以我臺灣的一方寸地做為研究對象，我們到底能知道什麼，又能洞悉什麼呢……？[58]

這正是他向來所提倡的「臺灣研究」，但臺灣卻是殖民地，在日本帝國中只是邊陲客體的存在，而臺灣文化也只是殘壁中的小花，若做為研究對象，只要手段和技術有其水準，仍有其研究價值。「士林特輯號」就在他這樣的思維下展開。

在特輯中，除了〈卷頭語〉外，他還寫了〈士林先哲傳記資料初輯〉，

57 楊雲萍，〈士林文化展出品の臺灣研究必讀十書〉，《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24 日，第 4 版；〈臺灣研究必讀書十本〉，《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陳奇祿主編），1949 年 5 月 17 日~12 月 27 日。又經筆者推薦給史語所林富士，轉而刊登在《北縣文化》，第 37 期，1993 年 6 月。有關楊雲萍與〈臺灣風土〉的關係，可參考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62~63、67。

58 楊雲萍，〈研究と對象〉，《民俗臺灣》1 卷 6 號，「士林特輯號」，總卷第 6 號（1941 年 12 月），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引用文獻外，也有自行採訪的成果，共舉出包括他祖父楊錫侯（1843~1927）在內的 24 人（頁 2~6）。〈士林街〉則對士林範圍、行政沿革、地名由來、地方名勝加以說明（頁 18~19）。此外，撰文者還有潘迺禎、曹永和、金關丈夫、立石鐵臣、三島格（1919~2004）等人。[59]誠如立石鐵臣在〈編輯後記〉所說，該特輯的完成對臺灣而言，是劃時期的工作，地方史料的發掘，對臺灣文學史的編纂必須提供豐富的史料。[60]而這也展示了誇稱具鄉土之愛的楊雲萍，所做相當完美的演出。往後《臺灣風物》有地方專輯，其來有自。

（四）在《民報》與《臺灣文化》之間

做為文學家身分的楊雲萍披上了皇民文學奉公班的頭銜，寫作《部落日記》；做為史學家身分的他，卻盡力在提倡臺灣研究，並身體力行。文學與史學間的背行與矛盾，正顯出日治時期身為臺灣人知識分子的難為。其中有傾斜、有屈從、有順從、有反抗（消極、積極）、有堅持，論斷臺灣人物者不可將人截然劃分，也不能以「氣節」、「忠奸」做為對人唯一的檢證。

1945 年，戰爭終於結束了，楊雲萍面對一個全新的局面，舊學根柢使他在面對中國政府，較少語文轉變的挑戰，雖然他一輩子沒能學得「標準國語」。他雖曾參加大東亞文學會議，卻也在大會中發言要注意「臺

59 潘迺禎，〈士林歲時記〉，8~16；〈內山鑼鈸に就て〉，23、〈士林市場について〉，42~43；曹永和，〈士林の古碑〉，20~22、〈士林の傳說〉，24~25、〈士林寺廟志〉，36~41、〈士林聽書〉，44~45；立石鐵臣，〈士林の月〉，26~27；三島格（任教於板橋國民學校），〈士林雜記〉，32~34；石原靜三（臺北州協議會員、臺灣教育會囑託），〈芝山巖移轉當時に於ける學務部の情況〉，18~19；金關丈夫，〈士林刀〉，28 後插頁。而後在 1941 年 10 月 1 日《臺灣藝術》2 卷 10 號寫了一篇〈故鄉への愛〉，來記明他對士林的愛。

60 1943 年 8 月 25 日，楊雲萍被指定為臺灣代表，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8 月 17 日他在「第二次大東亞決戰文學會議」第二分科發言，而後刊載於當年 9 月 10 日的《文學報國》中。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文學史」的研究；[61]對魯迅（1881~1936）也有相當的認識；他的詩在戰後曾被介紹到中國，[62]因此他在改朝換代之際雖難免於時代的衝擊，但比諸其他任過日本公職的臺灣人先、後輩，他在面對祖國時的立場是較不尷尬的。

《民報》是戰後臺灣民間最早發行的報紙，創刊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迄 1947 年 3 月止），社長林茂生（1887~1947），發行人為吳春霖（1901~？），實際事務由總主筆陳旺成（1888~1979）主持，總編輯為許乃昌（1906~1975）。據何義麟研究，文藝編輯為楊雲萍與吳濁流（1900~1976），[63]事實上楊雲萍寫時評、星期專論、社論，不該只是「文藝編輯」，只是因「社論」有的未具名，以致不能確認。幸好在整理楊雲萍遺物時，其次女楊淑婉發現《歷史與時事》第一冊剪報，得以瞭解戰後迄 1947 年 1 月 11 日止，他在《民報》所寫的文章：

1945.10.10 〈紀念先烈〉
1945.10.14 〈文獻的接收（上）〉
1945.10.15 〈文獻的接收（中）〉
1945.10.16 〈文獻的接收（下）〉
1945.10.22 〈奪還我們的語言（上）〉
1945.10.23 〈奪還我們的語言（下）〉
1945.10.27 〈光復與「復古」〉
1945.11.6 〈論言論之效果〉
1945.11.26 〈學術與國界〉（社論）
1945.12.2~3 〈我們的「等路」臺灣的文藝與學術〉（評論）
1945.12.4 〈人材的評價〉（時評）
1945.12.13 〈提議編纂「臺灣史」〉（社論）
1945.12.25 〈一個誤會〉

61 《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9 月 4 日，〈兩項提案〉。一是編纂大東亞各國各地域的文學史，或其概要之類的書籍，二是關於中國書籍騰貴的對策。

62 范泉，〈楊雲萍〉，《創世紀》（上海：寰星書店，1947），142~148。

63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報紙之保存現況與史料價值〉，《臺灣史料研究》8（1996，臺北），88~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5.12.30 〈關於民意機關〉（時評）
1946.1.11 〈憲法公佈後應有的作風〉
1946.1.15 〈統計與民意測驗〉（社論）
1946.1.17 〈關謠關諺〉（社論）
1946.1.18 〈日本政界的昨今〉（社論）
1946.1.19 〈日本天皇制的問題〉（社論）
1946.2.9 〈商人的反省〉（社論）
1946.2.27 〈宣傳的工作〉（社論）
1946.3.5 〈送歸國的日僑〉（社論）
1946.3.16 〈對圖書館界的希望〉（社論）
1946.3.17 〈關於鄭成功〉（星期專論）
1946.3.27 〈琉球與「琉僑」〉（社論）
1946.4.3 〈憎惡不正的勇氣〉（社論）
1946.4.9 〈印刷與變化〉（社論）
1946.5.19 〈中山詩文集及其他〉（評論）
1946.11.25 〈文藝家在那裏〉（社論）
1946.12.29 〈信賴民眾？〉（社論）
1947.1.4 〈希望屬於我們〉（社論）
1947.1.11 〈憲法公布後應有的作風〉（社論）[64]

上述對政治、社會的評論暫時不說，且看他對戰後臺灣文化、臺灣史方面的想法。

1. 修纂臺灣史

由於日本治臺採「湮滅歷史的政策」，因此如何進行「歷史的接收」，並組織「臺灣史編纂委員會」（或調查委員會），乃為臺灣最重要的事。楊氏在《民報》出現的第一篇文章〈紀念先烈〉中，即已指出要紀念先

64 本目錄由《歷史與時事》第一冊、楊雲萍剪貼，再加上計畫中的〈年表〉編成，由於寫「社論」、「時評」、「短評」時未具名，因此無法在 1946 年 4 月到 10 月的《民報》中找到相關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烈，替被誣為「土匪」的先烈翻案，「但是除去敵人的記錄以外，我們竟沒有絲毫的史料」。[65]因此必須要接收日本留下的文獻，如蕭何接收秦的文獻，包括集中在臺灣總督府的行政關係檔案，更調查當時尚未出版的資料，以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珍藏品，如「羅斯文庫」。[66]此外對「日本學者的努力，應該加以嚴重監視」，因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但是必須努力矯正在臺灣而不研究臺灣史的現象。他指出臺灣不是沒有歷史著作，如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5）《臺灣島史》、禮密臣《臺灣島之過去與現在》、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連雅堂《臺灣通史》都是，但上述的書限於時勢、才幹、方法，各有短長，因此必須有一部綜合的「臺灣史」，這才是處在重大時期（初光復，後朝修前朝史）所應做的「不朽的事業」。[67]省政府往後修《臺灣省通志稿》，可視為對此建議的具體回應，而綱目原先也是由他來草成，[68]但《臺灣省通志稿》是不是就是楊雲萍心目中的「臺灣史」呢？不得而知。

2. 臺大必須做臺灣研究

他在 1946 年初提出臺大應該研究「高山族的語言、習慣，或者臺灣的歷史、文化，臺灣特有的動植物，臺灣特有的疾病」。其他大學雖然不是說不能研究臺灣，但只有臺大才有充分的條件能完成這種研究，亦即他所謂的臺大應當「進行或完成若非臺灣大學則不能成就的業績和研究」。他在〈學術與國界〉一文說：「臺灣在日本統治下時，曾有一位『臺灣』的學者，痛責『臺北帝國大學』的對於『臺灣研究』的怠慢、

65 楊雲萍，〈紀念先烈〉，《民報》，1945 年 10 月 10 日。

66 據楊雲萍，〈文獻的接收〉（中）一文指出：「前年〔指 1943〕臺灣總督府支出日金五十萬所購得的『羅斯文庫』是關於海南島的最豐富、最完備的特藏。記的〔得〕數日前，此文庫的關係者某君，曾造訪小盧〔盧〕，說『羅斯文庫』在千難萬苦中竟運到基隆，只是沒有貯藏的安全地，他說想要寄存在筆者處，可是我的小屋子那裏容得那麼多的書冊，所以就作罷論了。後來不知道收藏在那處，可是『羅斯文庫』已運到臺灣，那是沒有疑義的。」《民報》，1945 年 10 月 15 日。

67 楊雲萍，〈提議編纂「臺灣史」〉，《民報》，1945 年 12 月 13 日。

6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7 月 7 日、8 日」，未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冷視事實，堂堂的『臺北帝國大學』建在臺灣首都臺北的『帝國大學』的『文學部』，竟沒有一關係於『臺灣文化』的講座，從學術的本身這是多麼不該的事。」[69]那個臺灣學者正是楊雲萍本人。而有關臺灣史的課程要到他自己在臺大首創，但也僅是如此而已。國內大學普遍開設臺灣史的課程要到 1980 年代以後，中間相隔三、四十年。

3. 圖書館要成為研究臺灣的歷史、文化機關

他認為圖書館不應只是藏書、看書的機關，應該具有三項積極的義務，一是做為臺灣與中國內地文化交流之「河道」，二是輔助學校教育之不足，三是成為研究臺灣史、文化的機關之一。

4. 研究臺灣文化，發揮印刷的使命

首先就是要奪回自己的「母語」，[70]但要注意所謂「復古」，不能只因為「臺灣古來所有的」，「乃不論加減乘除，也乘時隨之出現」。[71]臺灣不是沒有文化，在日治時期的壓迫下，臺灣文化仍是「石壓筍斜出」，並非如短視者認為，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幾乎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思潮隔絕，臺灣已沒有思想、學術的演進，那是一個誤會」。[72]他甚至抨擊說：

> 對於一部分的新來的外省的同胞，不明白「實際」，只立在「誤會」之上，排出「指導者」的架子，用從我們來看已沒有什麼希望的「東西」，得意地想要來教訓我們的諸位，喚起了些少的反省而已，遼東之豕，古已有例矣！[73]

他認為臺灣文化不是那麼沒氣力的或是被限的，因此他在報章上呼籲，想要促進臺灣文化，臺灣人不能抱殘守缺，應該促進內地文化的儘量湧入，鼓勵臺灣自身文化研究，並正視紙張、印刷費用暴漲的問題。[74]因

69 楊雲萍，〈學術與國界〉，《民報》，1945 年 11 月 26 日。
70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上）、（下），《民報》，1945 年 10 月 22、23 日。
71 楊雲萍，〈光復與「復古」〉，《民報》，1945 年 10 月 27 日。
72 楊雲萍，〈一個誤會〉，《民報》，1945 年 12 月 25 日。
73 楊雲萍，〈一個誤會〉，《民報》，1945 年 12 月 25 日。
74 楊雲萍，〈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1946 年 2 月 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印刷是表現臺灣文化的面相之一，如有好的刊物並能加以流傳，則文化經由流通而得以比較、學習，他甚至指出：

> 本省如不要文化的建設、文化的提高，那麼沒有話可說，如是文化云云的話，第一要使「印刷」得發揮它的本來的使命。[75]

由上可知，不管在戰前、戰後，楊雲萍對研究臺灣歷史文化的提倡莫不身體力行，說他是繼連雅堂、林獻堂以下的史家是毫不唐突的。

5. 在《臺灣文化》的角色

戰後，國民政府，特別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改造臺灣的文化頗為努力。當時有二個行政單位，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臺灣省編譯館，及由半山游彌堅（1897~1971）領導的臺灣文化協進會，在進行文化工作。[76]楊雲萍既是協進會會員，又是行政長官公署的參議，在臺灣省編譯館任職（後敘），可知在臺灣文化的「再構築」上，他扮演要角。

臺灣文化協進會創立於 1946 年 6 月 16 日，其目的真正與文化有關的是改變被奴隸化的臺灣文化、推廣學習國語國文等。設有理事會（由 21 人組成，常務理事 5 人，5 人互選 1 人為理事長）、監事會（5 到 7 人，由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選出，監事中互選 3 人為常務監事）。理事長下設總幹事，為理監事會議決事務的執行者，分總務、教育、宣傳、研究、編纂、服務 6 組，每組設主任 1 人。此團體可謂半官半民，楊雲萍獲選為理事，兼編纂組主任，換言之，他是其主要刊物《臺灣文化》的主編。《臺灣文化》一直發行到 1950 年 12 月告終，共發行 6 卷、27 期（26 冊）。[77]

《臺灣文化》主要是介紹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相關文藝關係的論文有 205 篇，社會方面有 14 篇，教育類 7 篇，政治類 3 篇，歷史學類

---

75 楊雲萍，〈印刷與文化〉，《民報》，1946 年 4 月 9 日。

76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東京：創土社，1999），12。

77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 10 篇而已，真正寫臺灣史的也只有陳紹馨的〈臺灣史料的整理〉（3 卷 7 期）一文罷了。楊雲萍雖為編纂組主任，但文稿並不是都是他編輯的，[78]除了編輯所需的〈近事雜紀〉外，他在《臺灣文化》發表的文章是創刊號中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79]似要彌補日治後期沒有機會談臺灣文學史之缺憾；唯一勉強和臺灣史較有關係的是發表在 3 卷 8 期的〈「劉銘傳紀念館」那裏去？〉。[80]顯然《臺灣文化》這本綜合文化雜誌對研究臺灣史的貢獻不大。

其實，此一結果也早可預料，他在〈臺灣文化協進會第一次大會宣言〉中隨俗地提出這個協進會的口號，即可知此雜誌的性質：

> 建設民主主義的臺灣新文化！
> 肅清日寇時代的文化的殘渣遺毒！
> 本省的文化以貢獻示範整個我中國！
> 三民主義文化萬歲。

臺灣文化協進會並非以研究歷史為主，[81]反倒是文化講座五回中有「臺灣歷史講座」、「五十年來の臺灣」是以臺灣史為主的。他在「臺灣歷史講座」中擔任講員，[82]但題目不詳。臺灣文化協進會雖然維持到 1950 年 12 月，事實上，該會的文化活動在二二八事件後陷入停止狀態，楊雲萍未能在這個組織中發揮所長。

---

78 據黃英哲研究，《臺灣文化》1 卷 2、3 期，2 卷 1、2、3 期編輯由臺灣文化協進會掛名，實際上是蘇新編的，5 卷 1 期（1948 年）以後沒有編輯名稱，實際上是研究組主任陳紹馨編的，其餘都署名為楊雲萍。見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75。

79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創刊號（1946 年 9 月 15 日，臺北）。

80 楊雲萍，〈「劉銘傳紀念館」那裏去？〉，《臺灣文化》3 卷 8 期（1948，臺北）。

81 此手稿據查為 6 月 16 日成立大會時宣言的原稿，由楊雲萍主筆，但與正式發佈的宣言不同，如宣言是「建設民主的臺灣文化，建設科學的新臺灣」。見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99。

82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105。「臺灣歷史講座」於 1946 年 8 月 23~30 日召開，參加者 90 多人，講師有楊雲萍、謝東閔、戴炎輝、岩生成一、富田芳郎、國分直一、連震東、陳紹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

在中國歷史上，後朝對前朝展開文化消毒工作，可謂史不絕書，因此中國在臺灣清算日本文化的遺毒亦為勢所必然。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兩個行政單位和一個半官半民的臺灣文化協進會來主導，三者中扮演提供教材內容的臺灣省編譯館，特別注重清理文化遺毒的責任。臺灣省編譯館成立於 1946 年 8 月 7 日，而許壽裳（1883~1948）先於 7 月 8 日被任命為館長。[83]臺灣省編譯館主要的工作為彙編一般大眾的公訓教材、編輯民眾的教本、編纂學校教科書。其下分四組、二室，一為學校教材組，二為社會讀物組，三為編譯組，四為臺灣研究組；以及秘書室、資料室二室。此一編譯館的設立，顯示出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確對改造臺灣文化有相當程度的熱情，也對編譯館有很大的期待。[84]

楊雲萍與許壽裳素昧平生，何以許會任命他為臺灣研究組組長？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戰前以來楊雲萍一直提倡研究臺灣歷史與文化，且身體力行，有日治時期的著作和發表在《民報》的作品為憑，具有足夠的能力；二是楊受知於陳儀，先在 1946 年 4 月取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甲種公職候選人審查合格臨時證明書，取得進入官場必要的資格，6 月 28 日獲聘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遂在 7 月 29 日得到「臺灣省編譯館編纂暨編審聘書」，8 月 7 日任臺灣研究組組長。[85]

楊雲萍在許壽裳過世多年後，於 1981 年為文追憶，說他有一天在臺

---

83 許壽裳，浙江人，是浙江派遣的官費留學生，在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學日本語時，結識同鄉魯迅而成莫逆。1908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在日本前後七年，而後回中國服務，戰爭結束前在重慶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1946 年 7 月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1947 年 5 月，編譯館被裁撤後，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8 年 2 月死於他殺。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53~54。

84 據黃英哲引陳儀寫給許壽裳的未刊信件，陳儀要許壽裳做的事有五項：（1）中小學校的國文與歷史教科書非編不可；（2）中小學校教師用的參考讀物亦非編不可；（3）為宣傳三民主義及政令，非編適合公務員和民眾看的小冊子不可；（4）一般的參考書，比如說辭典，此外希望能譯五百部名著給各階層的人看。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56~57。

85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236~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文化協進會事務所（中山堂三樓）時，洪炎秋（1899~1980）突然來造訪，表示許壽裳要和他見面。據許說他在北京時曾看過楊雲萍中、日文的著作，希望楊進入編譯館工作，許看到楊已是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又說兼任亦可，楊乃立刻答應。[86]楊並推薦淺井惠倫（1895~1969）、國分直一（1908~2005）、立石鐵臣在臺灣研究組工作。和許交談過的楊，大概對許壽裳、陳儀要在編譯館達成的目標產生共鳴，而許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對臺灣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更未對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學術文化全面予以否定。楊認為臺灣文化的特色有二：一是農業發達，教育普及，具有工業基礎，容易實現民主主義，誠為三民主義實行的基礎；二是在日本人留有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如能加以翻譯、印刷，將對社會有所貢獻，若未能完成，也希望其人能留下來完成。這也就是館內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留用上述三人的原因。[87]此外，留用於臺灣研究組的日本人還有池田敏雄、素木得一。[88]

臺灣研究組的研究範圍有那些？以下這些項目都是過去楊雲萍所提倡，且為留用日人的專長項目，茲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說明如下：

1. 編印臺灣文獻目錄。
2. 編印臺灣研究叢書，內容分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民俗、宗教、農業、工業、動物、植物、氣象、地質、醫學各項。
3. 編印臺灣昔時文獻。
4. 臺灣先史時代遺跡之發掘與研究。
5. 臺灣民俗研究。
6. 臺灣高山族語言研究。
7. 出版《臺灣學報》（原稱《東寧學報》，只刊行 1 期）。

---

86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 卷 4 期（1981，臺北），28。

87 這三名是臺灣研究組的成員，見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71~238。

88 素木得一（1882~1970），專長為昆蟲學，札幌農校本科畢業，1916 年取得農學博士學位，在臺北帝大任昆蟲學及養蠶學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博物學會會長。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編著臺灣地理。
9. 編著臺灣史。
10. 調查本省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
11. 其他。[89]

這些計畫如果陸續完成，楊雲萍研究臺灣文化的心願將能達成，然而不幸的是，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臺灣省編譯館在省主席魏道明（1901~1978）上任後的第一次政務會議中決定裁撤，將剩餘的工作[90]移交給臺灣省通志館（即往後的臺灣省文獻會）。[91]而楊雲萍也將轉換到另一個可以專心做臺灣史研究的舞臺。

編譯館何以被裁撤？有人認為編譯館是陳儀為許壽裳量身訂做的，陳儀去職，編譯館自然不可能存在；也有人認為這是魏道明在南京時即已得到國民黨 CC 派的指示，必須中止編譯館，因為許常反對 CC 的法西斯教育。[92]不論如何，臺灣歷史的編纂工作仍告功敗垂成，這對楊雲萍一定造成很大的衝擊。他在編譯館時只在《臺灣學報》發表一篇〈臺灣書志考〉，以及為社會讀物組的「光復文庫」編寫〈劉銘傳與臺灣〉，但未見出版。[93]據筆者多次和楊雲萍聊天，幾次嘗試想要得到他對陳儀的看法，但楊都只說陳儀十分敬重、禮遇他，而從未對其及二二八事件提出任何批判，這是他和當代臺灣知識分子間較特異的立場。

---

89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110。

90 楊雲萍在《臺灣文化》中的〈近事雜記六〉列舉臺灣研究組未完成（未完成書目），和《臺灣學報》比對後，尚有一些文章未刊（中有一、二篇尚未完稿），此即森下薰，〈瘧疾特論〉、賴子清編，〈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素木得一，〈臺灣昆蟲相〉、鄭恒譯，〈臺灣氣象〉、張常惺，〈過去日人在臺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金溟若，〈臺灣文治、武備沿革史略〉，立石鐵臣畫，〈石器圖譜〉；此外傳鈔與校勘準備重印的書有三種：《臺灣通志》、《小琉球漫志》、《使署閒情》及〈臺灣關係文獻目錄〉的編輯。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72~174。

91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87。

92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83。

93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73；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73，註 1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在臺大的教授生涯

臺灣省編譯館無預警地在 1947 年 5 月 16 日遭廢止，陳儀則先於 5 月 11 日離臺，行政長官公署廢除，做為參議的楊雲萍除了繼續編《臺灣文化》，頓時成為無業。雖然其遭遇令人惋惜，但能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存生命亦無何可怨，之後不只在許壽裳的協助下，任職臺大當教授，還成為全臺灣最幸運的人，也是第一位在臺大教授臺灣史者。

（一）任職臺大歷史系教授

許壽裳身為臺灣省編譯館館長，在 1947 年 5 月 15 日已得到臺大送達的教授兼中國文學系系主任聘書，[94]當時一個人身兼兩份專職並不違法。對他而言，編譯館雖被撤銷，幸有臺大教職，雖有遺憾，尚能糊口，故只惋惜失卻此一文化事業機關的職位。但對館內沒有其他兼職的屬下而言，可就是難關，他只能向臺大陸志鴻（1897~1973）校長去討職位，以便安插。在陸志鴻協助之下，國分直一任臺大史學系副教授，立石鐵臣任臺大史學系講師，李霽野（1904~1997）是臺大外文系教授，李何林（1904~1988）任臺大中文系副教授，[95]楊雲萍亦獲聘為臺大史學系副教授，[96]但遭楊雲萍拒絕。主要原因是臺灣省編譯館的職級是館長、編纂、編審、秘書、編輯、助理編審、特約編審等，[97]編纂相當於大學教授、編審等於副教授，編輯等於講師，而組主任等於大學的系主任，楊是臺灣研究組編纂兼組主任，因此不願降級任副教授。[98]

---

94 〔日〕北岡政子、秦賢次、黃英哲等編，《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93），250，5 月 15 日。

95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176。

96 北岡政子等編，《許壽裳日記》，260~261。8 月 30 日陸志鴻將楊雲萍副教授的聘書寄給許壽裳，9 月 1 日許寄給楊，9 日楊雲萍辭副教授

97 「臺灣省編譯館組織規程」共 15 條，1946 年 8 月 2 日公佈， 1947 年 2 月 8 日公佈修訂規程，此編制指的是修訂後。見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63。

98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 卷 4 期，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雲萍出身士林世家，父親是醫生，家境優渥，且舊、新學俱佳，早已有一股淩人的傲氣，面對真理或別人的錯失，他非得要辯個清楚不可。他完全沒想到上述對「研究組編纂兼組主任」等同教授，是無限上綱的比對，是許壽裳對他的特別推薦、陸志鴻校長的拔擢，並非楊當時已具「教授」的資格，何況他並非帝大的畢業生。舉例來說，畢業於京都帝大，且在滿洲國大陸科學院任職過的翁通楹，戰後臺大工學院請他去當助教，但他有大陸經驗，知道帝大畢業生回中國都當副教授，因此回拒臺大。而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即成大的前身）欲聘其為講師，但他一聽說該校畢業生都當到副教授，他認為帝大畢業生不能去當講師，經過這一折騰，在接到任職臺大助教的朋友告知，臺大已將助教都陞為講師時，他才在 228 事件後入臺大工學院機械系當講師。[99]再舉個例來說，有帝大博士學位、且具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資歷的戴炎輝，戰後回臺大任教，也不過是副教授而已。[100]

許壽裳來回奔走後，1947 年 8 月，楊雲萍以教授資格任教於臺大歷史系。[101]是年，臺大文學院史學系成立六個研究室（由帝大時期五個講座演變而來）：中國史學、西洋史學、南洋史學、日本史學、民族學、社會學研究室。楊雲萍入中國史學研究室，從事「晚明清初史」、「臺灣史」的研究，並兼日本史學研究室的主持人，[102]開始了他在學院研究臺灣史的生涯。

（二）講授臺灣史

1947 年 9 月到 1977 年 6 月，即楊雲萍 70 歲，正式於臺大歷史系退休為止，一共在臺大教書三十年，如果包括退休後仍在臺大兼課，一直

99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楹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474~475。

100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1 版 4 刷），1285，蔡說麗撰，〈戴炎輝〉。

101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243。1947 年 8 月，楊以教授資格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系，9 月 9 日獲頒聘書。

102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9 期（1948 年 3 月 1 日，臺北），第 4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 1986 年這十年加起來，在臺大整整教書四十年。這期間他開過的課有「明史」、「南明史」、「歷史哲學」、「臺灣史」、「日人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後兩門課是專門開給博士班上的。不論開的是那一門課，他最重視的是史料的介紹與史觀的建立；所引用做為教材的，除了中文著作外，最多的是日文，英文、德文次之。

筆者在 1978 年 9 月開始修習臺大博士班課程，1979 年修其「日人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1980 年修他為我一人、也是唯一一次開的「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1981 年我又旁聽「南明史」的課，沒有機會修其「明史」、「臺灣史」、「歷史哲學」等課。以下談到我修過的課，我會加上自己的感覺，不另加註；其餘則使用楊老師（本文只在本節使用老師，以示尊敬）留下的筆記手稿（藏臺大圖書館）做為討論的主要內容。

有關「日人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這堂課（4 學分），是博二學生必修課，採用的教材是內藤湖南（1866~1934）的《清朝衰亡論》，這門課在第二研究室上，大半是楊老師天馬行空的談詩論史，而不特意談內藤湖南，也少談日本人對中國史的研究，興之所至，可以臧否人物，這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我和已故逯耀東（1933~2006）學長的感受可能有點不同，[103]那就是老師全部用漂亮、優雅的福佬話上課，使我的學術母語精進不少。我和同班同學、學妹各自有一本「楊子語錄」，記錄老師口出的名言，可惜目前尚不知躲在我書堆的何處。

另一門課「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是開給我一人修的，因為王伊同教授回臺開課，原本是一年的課，但因「中」美斷交，他教了上學期就回美國去了。因此我少了 2 個學分，王曾才所長乃特別請楊老師幫我開了這門課。老實說我已忘記師生相對上課，老師都教些什麼，但我的收穫仍然是「福佬話」的精進，以及老師孤傲看不起人時如何下「評語」。老師也很喜歡「捉包」，我想，這一個不盡然是好的「習慣」，此刻的

103 逯耀東，〈懷念楊雲萍先生　那棵孤佇的檳榔樹〉，《中國時報》，2000 年 8 月 16 日，第 37 版。那棵樹，楊師母說是「ㄧㄚ ㄗ˙ ㄕㄨˋ」（椰子樹），也許逯學長說檳榔樹是對的，但感情上，那還是棵ㄧㄚ ㄗ˙ ㄕㄨ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正在繼承著，雖然我常引以為戒，有時也頗能引以為樂——在枯燥的研究工作中。

楊老師明史的課，據修過課的人說，往往朱元璋還沒有打到大都，明史的課已結束，這是臺大師生間早已傳聞的事實。有一次他為了突破這個困局，終於在最後一堂課帶著朱元璋一起上大都，「phē^{n}-phē^{n}-chhoán」（氣喘不已）。他告訴我時，笑呵呵的樣子我還記得。在其遺稿中發現了《明史》（講義大綱）：

1. 序說
   A. 通史與斷代史
   B. 明史之特別位置——在中國歷史上（明史研究不能輕視，中國史 3,000 年中之 300 年〔1368~1661〕屬於近世史或近古史，以樹木譬之，已近末梢）
2. 參考書舉要：《明史》、《明史稿》、《明書》、《罪惟錄》……etc.
3. 明代大事年表
4. 明代概說：建國始末
   A. 對外經略、武功
   B. 對內統治、官制沿革
   C. 文化、思想、學術、文藝、藝術、工藝（陶器）
   D. 明代諸帝（君權極盛時代）太祖與成祖
5. 結論

楊老師大概講到 2，課就結束了。

「歷史哲學」這門課開在 1949 年，楊老師所留筆記堪稱完整，共有 35 頁。第一章序論：(1)談何謂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ical philosophy）；(2)什麼是歷史哲學？他對歷史哲學有以下的看法：

> 「歷史哲學」是探究、認識內在於具體的歷史事物之普遍性、根源性。歷史哲學與歷史學雖不是同一物，可是不是相反，而是統一，不是相敵而是相成，歷史哲學是以實證的歷史學的具體的研究，而探究、認識它的普遍性和根源性的。

第二章歷史的存在，引用 11 種相關歷史哲學的著作，除 11 本西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者作品外，也介紹清代章學誠（1738~1801）的《文史通義》，其中他對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的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ehte*（《世界史之哲學》）有詳細的介紹。第三章歷史的認識；第四章歷史的敘述（本章缺）。剛進臺大即開這門課，可說十分吃力，為了講課，史家的他，讀遍不少德文哲學名著，取其精華為學生授課。

我自 1980 年迄 2000 年老師仙逝為止，每一年農曆年都去拜年（1986 年家母病危那一年例外），都會遇見臺大哲學系的黃振華教授。楊老師告訴我那是他教「歷史哲學」唯一 chhun（留下）的學生。

南明史的課，據我旁聽的結論，仍偏重在觀念的啟發以及因材施教，看修課的學生是誰，而給予不同的「點撥」。如何傳馨修的「南明史」，大半在談文徵明等人的畫作，因為何學的是藝術史，是不是包括在「南明」的範圍，那就不需去計較了。楊老師開出的南明史參考文獻為：（1）《罪惟錄》、（2）《明史》、（3）《鮚埼亭集》、（4）《南明野史》、（5）《南明綱目》、（6）《鹿樵紀聞》、（7）《思文大紀》、（8）《明季遺聞》、（9）《南疆繹史》、（10）《明季南略》及《明季北略》、（11）《小腆紀年》、（12）《小腆紀傳》、（13）《華夷變態》、（14）《清朝實錄》（崇德、順治、康熙朝）。南明史的範圍起至明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至明永曆十五年十二月（桂王朱由榔於緬甸被執止），有別於晚明（指萬曆、天啟、崇禎共七十一年，加上南明十八年，共九十一年）。至於研究南明史的態度，楊老師有如下看法：

> 所謂南明史固中國史之一部，研究南明史的態度，當不有異於研究中國史者。只是南明史乃一部中國民族「抵抗異族」最激烈、最顯著之一段歷史，可歌可泣，而時代又近，故有時易為「感激所激」多做「歌頌」，或由於政治的、社會的需要，故為渲染，皆非做學問之態度也。吾人當持客觀的態度，以探討史事之真相，而有認識事物，方得有真實之感情，方得對政治的、社會的需要，有真實的貢獻。

他將南明史止於永曆十五年，而將鄭成功（1624~1662）三世在臺歸於臺灣史的範疇，鄭成功之前則為荷西時期，此一史觀為其學生所接受。逯耀東說「清雖亡明，明統仍繫於海外一線，臺灣史即承其統而發展，這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現在他的學生研究臺灣史所不願繼承的」，[104]此種看法不盡客觀。

至於做為他完成宿願的臺灣史課程，他是如何來上？問過幾個學弟、妹，印象都是抄黑板上的板書，人人都有本筆記。學生的筆記還被楊老師的同仁方豪教授借去看，方老師共借了兩本，一本是韓國學生的，一本是鼎鼎大名許極燉的。方老師此舉是為了瞭解楊老師上課的內容，好增加自己的臺灣史知識，準備要投入臺灣史研究的領域，一直到 1975 年才在臺大歷史所碩士班開「臺灣史研究專題」的課。[105]而楊老師臺灣史的課到 1978 年才轉由黃富三教授開，期間整整二十多年時間，他是唯一開臺灣史的老師，可說是承先啟後的臺灣史研究者。

對楊老師而言，研究臺灣史最重要的是認識史料。以烹調來做比喻，要先學會看得懂菜、挑菜，才有可能做出一盤人人叫「讚」的「料理」。在學校中，他要教的就是懂菜、挑菜的本領。在課堂上，他往往先介紹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其次是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三是里斯的《臺灣島史》、四是甘為霖的《荷蘭治下的臺灣》及《廈門音新字典》、[106]五是禮密臣的《臺灣島之過去與現在》。不僅介紹史料、史學者，也將當時歷史解釋的爭議點提出來討論，這麼一來，往往學期就快結束了。

和他同時任教臺大的方豪教授，自來臺的第二年即開始研究臺灣史，並且發表一系列的研究。楊師總想去挑些缺點來做文章，僅以「東番記」的研究為例，方杰人師於 1956 年將《閩海贈言》景印，由其中找到了陳第（1541~1617）〈東番記〉後，說明沒有徐懷祖《臺灣隨筆》一書中所記的周嬰的〈東番記〉；[107]楊老師為文反駁，保留周嬰〈東番記〉出現的可能性。中國學者張崇根在周嬰《遠遊篇》中找到了他用賦體寫

104 逯耀東，〈懷念楊雲萍先生　那棵孤佇的檳榔樹〉，《中國時報》，2000 年 8 月 16 日，第 37 版。。

105 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李東華編，《方豪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2001），313。

106 〔英〕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臺南：自刊本，1913）。

107 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臺大文史哲學報》7 期（1956，臺北）；後收入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方豪自印，1969），845~8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東番記〉，證實了周嬰參考陳第的〈東番記〉，並加入當時觀察的實態完成。[108]在這方面楊師浸淫臺灣史料多有年所，不輕易證明或否定過去的記載，除非有充實的資料。

（三）指導博碩士生論文

由於早期臺灣史的師資，甚至藝術史的師資少，因此楊老師除了指導臺大歷史所的博、碩士生外，還必須支援其他學校。臺大文科研究所早於 1950 年 8 月即設置，分文、史、哲三組；1956 年，各組獨立設所，歷史所於同年招收碩士班研究生；博士班則設在 1967 年。由於當時學臺灣史的學生不多，因此他必須支援所外，甚至是校外。他所指導的學生，目前在臺灣史研究已嶄露頭角的不在少數（以指導論文為限）。

1. 所外、校外的博碩士論文

楊老師指導的第一個博士是出身於政大政研所的張世賢，論文題目是〈晚清治臺政策〉，1976 年畢業，主要結論是（1）晚清治臺政策係隨環境挑釁，逐漸調整、成長；（2）臺灣必須往海洋發展，拓展貿易，發展海權，實為形勢使然；（3）臺灣海峽關係治臺至鉅，清廷是否能控馭臺灣，在其海權之實力能否克服海峽之障礙；（4）清廷派駐臺灣之欽差大臣、福建巡撫、福建臺灣巡撫皆一時之選，慘澹經營，多至扶病內渡，然終未能確保臺灣，足見治臺不能以臺灣言治臺，必係以整個中國言治臺。[109]第二篇博士論文是政大政研所的楊熙所做，1980 年畢業，他的題目是〈清代前期治臺之撫民與理番政策的研究——康熙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其結論為撫民理番政策都有如下三個基本原則：（1）是視臺灣如同內地；（2）以漢文化為主；（3）順應臺灣社會變遷。[110]

108 張崇根，〈周嬰《東番記》考證〉，《臺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156~165。

109 張世賢，《晚清治臺政策》（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110 楊熙，《清代臺灣：政策與社會變遷》（臺北：天工出版社，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臺大歷史所的碩、博士論文

楊老師指導的第一篇臺大歷史所博士論文是筆者的〈清代臺灣武備制度之研究——以臺灣綠營為例〉，完成於 1984 年，主要探討臺灣綠營的特質，分由軍事制度、最高武官臺灣總兵及綠營中的組織三大部分來探討，發現在臺灣的軍事佈防的確必須因地制宜，和內地有很大的不同，以班兵制度為其最著。這篇論文也是全國歷史所中第一篇臺灣史的博士學位論文，筆者有幸，前期為方豪教授指導（迄 1980 年方杰人師病逝），後期為楊雲萍師所指導，不敢說得兩位老師的真傳，但確以兩人的學術成就為標竿，不斷努力中。此論文於 1987 年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改名為《清代臺灣的綠營》，楊師曾賜〈序〉。

至於碩士論文方面，最早的是（1）黃富三，題目為〈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1966 年畢業，劉銘傳（1838？~1897）是楊老師臺灣史研究中的重點人物，黃教授可謂得楊師之真傳；（2）張炎憲，〈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1973 年畢業；（3）陳秋坤，〈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區的開發〉，1974 年畢業；（4）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之經濟社會之變遷〉，1975 年畢業。

（四）教學中的研究成果

在全臺第一流的大學任教授，除了忙於教學外，研究工作相當重要，這時的楊雲萍以臺灣史與南明史研究為主。由 1950 年臺大校長傅斯年（1896~1950）過世時，他寫的一對輓聯即可證明：

南明史事東寧史事幾度斜陽同太息

磊落襟懷淡泊襟懷何處殘月哭先生[111]

嚴格說來，這以後他是以明史和臺灣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因為南明史應當包括在晚明史內，而南明史也是臺灣史源流的一支。他的著作中只有三篇不屬於南明史範疇內，一是〈明國子監考〉；二是〈明熹宗朱由校

111 楊雲萍，〈輓傅（斯年）校長聯〉，《公論報》，「日月潭」862 期，1950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試論〉；三是〈崇禎監五錢小記〉，[112]其中第二篇，也是唯一一篇刊登在《臺大歷史學報》的文章。

如果不計發表在一般報章、雜誌的文章，他的南明史與臺灣史研究可能各居一半，這些文章多半刊登在《公論報》、《臺灣風物》、《臺北文物》、《臺北縣文獻叢輯》、《南瀛文獻》、《史學集刊》與《集幣會刊》。張炎憲在 1992~1993 年為楊雲萍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一書時，將其著作分為「明清舊事」、「南明研究」、「南明的錢幣」、「鄭家三世」、「臺灣的文學與文化」、「雜論」，[113]已顯示出老師研究的重點。這本書可以看到三篇國科會的報告論文，即 61 學年度〈鮚埼亭集校勘記〉、62 學年度〈明毅宗朱由檢的研究〉、63 學年度〈明熹宗朱由校和其時代的研究〉。[114]除第三篇外，並未正式發表。以下僅就楊老師臺灣史研究的相關成果分別敘述於下：

1. 人物研究

臺灣史人物研究可說是楊老師研究臺灣史的重點，因為寫臺灣的人物等於在寫臺灣的歷史，他說：「對於只注意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等等，卻忘卻或忽視『人』的存在，我以為似有檢討的必要。」[115]他選擇的人物有的論其詩，有的論著作，有的追憶與傳主間的交情，不用說，鄭氏三世是研究的重點，自 1952 年 2 月 6 日起，在《中華日報》連載人物傳 120 篇，一直到 7 月 22 日結束。[116]在這 120 人的傳中，有的已是蓋棺論定的歷史人物，有些是評價兩極者，如柴大紀（?~1788）、劉璈（?~1889），有些是他一生中曾接觸的友人，或受知遇的長輩。不論成

112 楊雲萍，〈明國子監考〉，收入李宗侗等撰，《中國歷代大學史》（臺北：中華文化，1958），85~104；〈明熹宗朱由校試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後更名為《臺大歷史學報》）4 期（1977，臺北）；〈崇禎監五錢小記〉，《集幣會刊》2 期（1980，臺北）。

113 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共 824 頁。

114 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83~104、53~81、27~52。

115 楊雲萍，〈自序〉，《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1。

116 楊雲萍，《臺灣史上的人物》，2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楊氏筆下的人物的背景如何，楊雲萍談的最多的是連雅堂。[117]除這一系列的小傳外，他還為以下人物勾勒過其一生：伊能嘉矩、陸隴〔壠〕其、楊爾康（楊老師的祖父）、大直徐氏番祖媽、陳登元（1840~?）、石暘睢、胡適之（1891~1962）、方豪、池田敏雄、許壽裳、金關丈夫、王詩琅（1908~1984）、林柏壽（1895~1986）、王友竹（1866~1924）、吳鳳、黃景寅、沈傲樵等人。[118]

連雅堂的生平此處不必再敘，楊與連兩人相識，據楊氏言是在創辦《人人》雜誌時，於其中刊登《吟草集》中的序和詩，以及在《臺灣民報》刊的〈一陳人之手記〉，攻擊「舊文學陣營」中的代表作家連雅堂，彼此間有幾次交手。此事過後十多年，楊與連雅堂有過長談，連氏對楊

117 楊氏曾多次撰文記述連雅堂，見楊雲萍，〈一つの追憶〉，《愛書》10 輯（1938，臺北）；〈「劍花室文集」に就て（連雅堂の遺墨）〉，《臺灣時報》第 268 號（1942 年 4 月 15 日）；〈臺灣研究必讀書十本（1）「臺灣通史」〉，發表於《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以下簡稱〈臺灣風土〉）第 51 期，1949 年 5 月 24 日；《臺灣史上的人物》，284~285；〈詩人連雅堂〉，《中國一週》109 期（1952，臺北）；〈連雅堂與圓山貝塚〉，〈臺灣風土〉第 165 期，1954 年 3 月；〈連雅堂傳〉，《臺灣文化論集》2（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118 楊雲萍，〈「臺灣文化志」的著者〉，〈臺灣風土〉第 19 期，1948 年 9 月 14 日；〈陸隴〔壠〕其與臺灣〉，〈臺灣風土〉第 158 期，1954 年 2 月 1 日；〈楊爾康先生遺著〉，《臺灣風物》4 卷 5 期（1959，臺北；以下省略出版地）；〈大直徐氏番祖媽〉，〈臺灣風土〉第 187 期，1954 年 10 月 11 日；〈陳登元的事蹟及其遺作〉，《臺北縣文獻叢輯》（臺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1956），二輯；〈石暘睢先生的追憶〉，《南瀛文獻》10 期（1965，臺南）；〈胡適之先生的追憶〉，《中國時報》，1973 年 12 月 17 日，第 12 版；〈方杰人先生安息〉，《臺灣風物》31 卷 1 期（1981）；〈池田敏雄先生逝世紀念專輯〉，《臺灣風物》31 卷 2 期（1981）；〈許季茀先生的追憶〉，《書和人》426 期（1981，臺北）；〈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 卷 4 期（1981，臺北）；〈金関丈夫先生の思い出〉，《えとのす》12 號（1983，東京）；〈王詩琅先生追憶〉，《臺灣風物》35 卷 1 期（1985）；〈悼林柏壽先生〉，《臺灣風物》36 卷 2 期（1986）；〈滄海遺民王友竹〉，〈臺灣風土〉第 127 期，1951 年 1 月 26 日；〈吳鳳事蹟與一英人〉，〈臺灣風土〉第 133 期，1951 年 4 月 20 日；〈吳鳳碑記及其他〉，〈臺灣風土〉第 134 期，1951 年 5 月 4 日；〈關於黃景寅的詩〉，〈臺灣風土〉第 44 期，1949 年 4 月 3 日；〈關於黃景寅的詩（續）〉，〈臺灣風土〉第 45 期，1949 年 4 月 13 日；〈沈傲樵的遊臺詩篇〉，〈臺灣風土〉第 181 期，1954 年 7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當時我以為你〔楊〕纔配攻擊舊文學，因為你知道舊文學。」[119]楊以中年人面對垂垂老矣之連氏，自有一番受知遇的感動。因此 1936 年連氏在上海逝世後，楊一有機會即「表彰先德」，或是連氏的詩，或是連氏的《臺灣通史》。他常對筆者言，連雅堂在臺灣有如此的地位，是由他捧出來的。

在〈一つの追憶〉中（發表於 1938 年，連雅堂逝世一週年），楊氏追憶與連氏最後一次見面，兩人大談臺語問題（包括音韻和文字）的情形；並希望世人忘卻連雅堂為臺灣總督府撰文擁護續發鴉片執照一事。[120]他如此委婉卻又堅定地寫著：

> 關於連氏之風評和責難，我很清楚。特別是在連氏晚年發生的某一事件，我也深感遺憾。但是，我並不想如 Francois Villon 那樣，舉例來要弄辯護之詞。但是，對於留下「臺灣通史」和「臺灣詩薈」之人，世人現在仍無法稍稍減緩雷霆之怒與秋霜之制裁嗎？宛如世人是無罪之人一般。[121]

為連氏晚年發生的事深感遺憾，同時也勸世人在連氏已過世，也該不必再以為自己是無罪之人來指責他。

楊氏對連氏的詩才評價高於史學，即使如此，「做為史家的連雅堂，以臺灣通史一書已可不朽」。[122]「史學家連雅堂，因為他一面有詩人的天稟、詩人的情感，所以他和那些咬文嚼字的『史學家』不同。一部的《臺灣通史》，可以說是一篇悲壯的長篇『敘事詩』，儘管它在『史家』方面有不勘的錯誤和不備（而我自己常常指摘過它這些錯誤和不備），可是，瑕不掩瑜，這部名著的真價值，還是與臺灣的河山同其不朽。」[123]可說對連氏《臺灣通史》最佳的評價。因此，在〈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的演講中，他指出《臺灣通史》的缺點是：（1）所用的資料

119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臺北文物》3 卷 2 期（1954，臺北），50~56。
120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期（2006，中壢），50~55。
121 楊雲萍，〈一つの追憶〉，《愛書》10 輯，169~172。
122 楊雲萍，〈詩人連雅堂〉，《中國一週》109 期。
123 楊雲萍，〈詩人連雅堂〉，《中國一週》109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限；（2）抄襲他人的作品或僅改幾個字而不註明出處；（3）處理史料不夠嚴謹。[124]

在《臺灣史上的人物》一書中，楊氏描述連雅堂，既不談他和連的交情，也不說《臺灣通史》、《臺灣詩薈》，反而是探討連雅堂和王香嬋（信佛深後改為香禪）之間的詩，篇篇都悲壯、哀艷，但王與連氏的師友之情，則始終如一。又說「連氏和王氏的事情，是一悲劇；從表面看，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故更深刻。『子離離了』，雖然曾是『春風俱有意』，但是終於不得不『渺渺賦長征』」。[125]這和《臺灣史上的人物》其他的 119 人描寫的角度完全不同，且告訴人們用佛洛依德（S.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去解析連氏的詩作會有些幫助；而連氏和王氏間的事情，是理解連氏的為人和作品之一重要關鍵。但楊氏並非真的相信兩人之間確實清清如水。

有關臺灣人物的研究，將在下一節再分析。

2. 介紹史料

做為臺灣研究的先驅，又做為一個收藏家，他接觸許許多多重要的史料，更甄別其版本優劣，因此介紹史料、書籍乃成為他研究著作中重要的存在。他曾提出臺灣必讀的書十部，其中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誌》亦包含在內。《臺灣文化誌》是集伊能研究的大成，分上、中、下三冊，是其「三十年之臺灣研究總成果，以及畢生之學術業績總成果」。福田得三在書前的序，稱本書為「現代化之臺灣文獻通考」，楊氏認為「亦非溢美之詞，然而，終究還是一個人橫跨各方面之研究。因此，白璧中仍有微小之瑕疵」。[126]正如他肯定《臺灣通史》，卻又同時指出書中有不盡理想之處，如出一轍。

對連雅堂的《劍花室文集》，楊氏花較多篇幅介紹。他先說《劍花

124 楊雲萍，〈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收入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臺灣》（臺北：臺灣風物社，1988），上冊，1。

125 楊雲萍，〈連雅堂〉，《臺灣史上的人物》，284~285。

126 楊雲萍，〈臺灣研究の文化の先覚者伊能嘉矩〉，《臺灣時報》1月號（1941年1月），73~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室文集》得自陳逢源餽贈，而陳逢源則得自於連雅堂的高徒林紫珊，之所以在林處，乃 1925 年連氏要前往中國大陸時寄放的。不僅這本文集，還有如《寧南詩集》（共有 250 餘首詩）、《臺灣詩乘》，還有未曾刊佈的〈南洋拓殖傳〉，[127]以及連氏平常愛讀的書。[128]這些遺稿包在「五、六寸的包袱中」，楊氏以「感覺像是抱著連氏的骨灰罐」的心情帶回士林。接著楊氏發揮校勘的本領，將《劍花室文集》中的 62 篇文章一一校訂，指出這是已發表過的文章再經修改、推敲集成，有出書的打算。[129] 1960 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刊行的《臺灣文獻叢刊》第 94 號中即包括〈大陸詩草〉、〈寧南詩草〉、〈外集之一〉、〈外集之二〉，及詞四闕，稱為《劍花室文集》。

鄭鵬雲（1862~1915）編的《師友風義錄》，也是楊氏特別介紹的，此書分內篇、外篇、附篇，主要在網羅海內詩人，藉吉光片羽之珍，存知己一言之契而成。內篇選臺灣詩人（包括臺人和日人）的詩；外篇選錄除譚嗣同（1865~1898）、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作品外，另有鄒崖逋（1865~1930）、痛哭生、烏目山僧、最惡守舊者、鐵血子的詩，皆為有關戊戌運動的作品；附篇為〈擊鉢吟〉。楊氏以此書說出了微言大義：「臺灣當時雖淪陷於異族，可是，中國內地的種種的『運動』的影響，不論它是『政治』、或是『文化』、或是『社會』，是還要影響到臺灣的。換句話說：『臺灣』是沒有忘記過『中國』的，一一於此區區的『詩選』之類的裏面，亦可見之。」[130]

久保天隨（1875~1934）的〈澎湖遊草〉，於 1932 年刊刻，包括 50

127 1914 年清史館成立，趙爾巽為館長，連雅堂曾上建議書，應在清史中設「殖民志」，以記述中國之殖民海外者，但並未被接受，他自己寫了十二頁有關在南洋活躍的中國人的略傳，可見其志之一端。

128 如〈香祖詩集〉（蔡廷蘭著，一冊）、〈鰲峰詩鈔〉（陳錫金著，一冊）、〈豁軒詩稿〉（陳貫著，一冊）、〈聖符內著〉（胡殿鵬著）、〈瑞桃齋詩稿〉（吳德功著，一冊）、〈謎拾〉（南注生撰，一冊）、〈詩畸〉（南注生輯，二冊）、〈藝閣雜說〉（吳子光著，一冊）等。

129 楊雲萍，〈「劍花室文集」に就て（連雅堂の遺墨）〉，《臺灣時報》268 號（1942 年 4 月 15 日），84~93。

130 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544~5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篇詩，有福建陳衍（1856~1938）寫序，也成為楊氏介紹的對象。1929年，亦即臺北帝國大學創立的第二年，久保即自東京來臺，任教於臺北帝大，1934年歿於臺。楊氏不僅介紹有關澎湖的詩，也順便介紹久保的另一冊〈遊閩詩草〉，也就陳衍的序小小的「詼」一下。[131]楊氏雖早在1950年已將〈澎湖遊草〉介紹給學術界，但一直要到近年來才有陳速換注意此詩集，撰寫〈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並於2006年發表〈久保天隨《澎湖遊草》之語言風格探討（上）〉，[132]前後相隔逾五十年。由此也可證明，在當代楊氏的臺灣史造詣獨步臺灣史壇，無人能比，這必會使他覺得沒有知音。

除以上所列舉的書外，《櫟社沿革志略》、《無悶草堂詩存》、《普天忠憤全集》、《楊英從征實錄》這些目前很普遍的書，在《臺灣文獻叢刊》本未印行前，楊氏早已飽覽，並介紹給讀者。

3. 有關古文書、古印的介紹

古文書又稱為契字或古契字，楊氏對其出身地士林有關的開發文書，相當盡心地收集。這些書類在他過世後由張炎憲借往國史館，並予出版，名為《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133]但仍有遺珠未納編。楊氏最早發表有關臺北古文書的論文在1956年，他先舉出當時所見最早的為1709年（康熙48年）諸羅縣知縣發給陳賴章的「開墾單示」，並根據不同的版本校勘，惟未見原本。[134]而「陳賴章」在往後的研究中一直被誤以為是人，尹章義已看過原件，並證實這是墾號。[135]楊氏又據平山勳編著的

131 楊雲萍，〈「澎湖遊草」及其他〉，〈臺灣風土〉106期、107期，1950年7月24、31日。

132 陳速換，〈久保天隨《澎湖遊草》之語言風格探討（上）〉，《硓𥑮石》43期（2006年6月，澎湖），26~50。

133 楊雲萍藏，張炎憲、曾品滄編，《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臺北：國史館，2003）。

134 楊雲萍，〈有關臺北市的二三古文書〉，《臺北文物》5卷1期（1956，臺北）。

135 尹章義，〈臺北平原拓墾史研究（1697~1772）〉，收入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66。「陳賴章」應為戴岐伯、陳憲伯、陳逢春、陳天章、賴永和五個人合作的墾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六、七兩分冊載有「殘存於臺北地方之土地契約書」，刊錄古文書 38 卷，這些文書可說明臺北開發的部分情形，而這些古文書有些原件已到楊氏手中，因此也成為校勘的好資料。另外又介紹了「賣水契」，是有關霧里薛圳（周七股圳）的；還有大加蚋保三板橋莊的規約，他拿來和澎湖澳社的規約比較，得出前者充滿「命令的官僚口吻，不是由於民眾自發的『約束』」，後者則出自民間。[136]

楊氏另一篇介紹古文書的文章是〈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資料〉，主要是他買到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在 1898 年到 1901 年間向參事詢問有關臺灣「開疆以來所有經營、創建、興廢沿革及人民移住原由各案」，此文書是將參事問答所得，寫出臺灣早期暨北部開發情形，是瞭解北臺開發的重要資料。[137]

為了將他所存的舊檔案、古書契整理發表，以饗讀者，在《臺灣風物》相關人士的好意和督促下，楊氏自 1987 年 3 月到 1991 年 12 月（37 卷 1 期～41 卷 4 期）刊登 20 件，題為〈楊氏習靜樓藏臺灣古書契偶存〉，計發表〈偷竊恒春縣城木椽兩根嫌疑案〉、〈參事答案〉、〈雍正三年賣與園業契字〉、〈昭和十九、二十年期蔗作獎勵規程〉、〈海南島出張視察報告書〉、〈板橋林本源家的契尾〉、〈林本源家舊藏大稻埕實測古圖〉、〈臺北地方法院的內牒〉、〈關於小作人轉業報告書〉、〈鹿港乾隆時代店屋杜賣契字〉、〈鹿港輔信將軍店產爭議契約字〉、〈光緒鹿港繳典厝地基契字〉、〈日昭和初年保甲經費領收證書〉、〈臺北海山堡太高坑莊土地杜賣字〉、〈真宗臺北教會商議員囑託書〉、〈艋舺杜賣盡根店契字〉、〈佛銀貳大元的借銀字〉、〈出賣斷根房屋、水田銃櫃契〉、〈完單、收據、領收證〉、〈門牌〉。

另外，在土地交割時所訂的契，必須有官方、土目、通事的印，楊氏也買了不少臺灣古印，自 1980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987 年 6 月 30 日止（《臺灣風物》30 卷 4 期起到 37 卷 2 期），每次登載一顆，先將文錄入，再做說明，如〈岸裡社張通事戳記〉、〈岸裡社總土目戳記〉、〈北

136 楊雲萍，〈有關臺北市的二三古文書〉，《臺北文物》5 卷 1 期。
137 楊雲萍，〈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資料〉，《臺北縣文獻叢輯》，二輯，437~4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牛墟古印〉、〈新埔枋寮義民廟古印〉、〈鹿港古印〉等，不贅。

4. 有關錢幣的研究

做為收藏家的史家最能瞭解「錢幣乃最好的歷史物證資料」，由錢幣的成色變法即可看出政治的變革、經濟的興衰，因此不惜工本購藏錢幣。尤其他研究的明代，特別是南明的錢幣，為數最多。他所搜購的錢幣及上述古印，皆已入藏臺大圖書館。據黃富三所載，楊氏的錢幣有數千餘枚，其中較罕見的有 14 種：洪武通寶、順治通寶、昭武通寶、利用通寶、永曆通寶、永曆通寶（臺灣鑄）、天保通寶、鹹豐通寶、泰昌通寶、崇禎通寶、大明通寶、開元通寶等。[138]

除了收藏外，他也發表錢幣方面的論文，大半是關於南明錢幣，如〈記新得南明錢幣〉、〈南明時代的錢幣〉、〈崇禎監五錢小記〉、〈永昌當五錢試考〉、〈生肖八卦錢譜初稿〉、〈生肖八卦錢譜續稿〉、〈古語錢小譜〉、〈記新獲「西王賞功」帑〉；另有〈越南錢幣與中國〉一文，[139]具見楊氏的功力。

四、對臺灣歷史研究的貢獻

楊雲萍一生重要的史著，一為《臺灣史上的人物》，二為《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前者包括 120 篇人物傳及四篇附載，[140]寫於 1952 年，

138 黃富三，〈楊教授收藏——古錢幣、古印章〉，http://www.lib.ntu.edu.tw/manuscript/yangup/index.html.

139 楊雲萍，〈記新得南明錢幣〉，《錢幣天地》2 卷 1 期（1978，臺北）；〈南明時代的錢幣〉，《歷史博物館館刊》10 期（1979，臺北）；〈崇禎監五錢小記〉，《集幣會刊》2 期；〈永昌當五錢試考〉，《集幣會刊》3 期（1981）；〈生肖八卦錢譜初稿〉，《集幣會刊》6 期（1984）；〈生肖八卦錢譜續稿〉，《集幣會刊》7 期（1985）；〈古語錢小譜〉，《臺灣風物》34 卷 3 期（1984）；〈記新獲「西王賞功」幣〉；〈越南錢幣與中國〉，《中越文化論集（2）》（臺北：中華文化，1956）。

140 附載有四篇，（一）「人人雜誌創刊」前後，（二）蔣渭水先生之追憶，（三）楊爾康先生遺著，（四）「溪山煙雨樓詩存」序。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版於 1981 年，相隔將近 30 年；而後者則是張炎憲選編楊氏的重要論著而成。根據其著作年表，日治後期還出版兩本書，但目前已看不到，不知是否真出版了，一本是《臺灣文化の研究》，依楊氏手稿，包括五篇文章：（1）〈沈斯庵渡臺考〉；（2）〈楊英に關する一資料〉；（3）〈劉家謀の「海音」に就いて〉；（4）〈《鮚埼亭集》校記〉；（5）〈「臺灣書法」に就いて，其の他〉。[141]另一本是《民俗學の周邊》，包括五篇論文：（1）〈閩南地方に於けるこの鹿山教育資料〉；（2）〈臺灣府縣志に見えたる臺灣の民俗に就いて〉；（3）〈博士の一舊花集〉；（4）〈福州歌謠と臺灣〉；（5）〈臺灣舊慣調查會に就いて，その他〉。[142]

上述的著作是否可以略窺其對臺灣史的看法，有何創見？又他所存留的史料到底有那些是未來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他又如何參與《臺灣風物》雜誌的編輯工作？略敘如下。

（一）對臺灣史的看法

楊氏十分重視歷史的源頭，他同意季麒光之稱沈斯庵（1612~1688），「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以及全祖望（1705~1755）在《鮚埼亭集》稱其為「海東文獻，推為初祖」，做為漢文化進入臺灣的開始。換句話說，漢人的臺灣史由沈斯庵開始。[143]他更認為開啟漢人在臺政權的是鄭成功，而非議坊間所說的「恢復」，[144]如清代論鄭成功者皆曰開創，沈葆楨（1820~1879）在延平郡王祠的對聯中，即稱鄭成功的志業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

141 據楊師母黃月裡所做的年表，本書在 1943 年由清水書店出版，而這家書店在同年底出版了詩集《山河》。

142 本書由東都書籍株式會社於 1943 年出版，此書店是三省堂專門的販賣店，而後成為三省堂的旁系會社，1933 年 12 月在臺北設支店，參見持田辰郎，《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臺北支店史》。河原功，〈三省堂と臺灣——戰前期の臺灣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流通〉，《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290。

143 楊雲萍，〈沈斯庵〉，《臺灣史上的人物》，8。

144 楊雲萍，〈鄭成功的歷史地位——開創與恢復〉，《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367~3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唐景崧（1838~1924）的對聯下聯則是「驅外夷出境，開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均認定鄭成功是開創之局。鄭成功自己攻佔赤崁，向荷蘭人下令諭時即稱「東都明京，開國之業，可為萬世不拔基業」，也認定自己的功業是開創的，何以世人皆曰「恢復」？主要是荷蘭最後一任臺灣長官揆一（Fredrik Coyett，1615~1687）記載鄭成功傳見荷蘭使者時，說臺灣是他父親「借」給荷蘭的，據此遂做恢復論。在楊氏看來，這只是鄭成功為取得臺灣的藉口，並非事實。[145]時至今日，仍有學者非用「恢復」不可，旨在證明「臺灣自古為中國領土」，雖不值一駁，但迄今風行。

其次，鄭成功登陸日期是那一天？四月二十九日或四月三十日？學界為此曾有一番筆戰。事實證明，楊氏利用《熱蘭遮城日記》、《被忽視的臺灣》、Hendrich Indyk 的日記、《巴達維亞城日記》等西洋文獻，斷定 4 月 30 日為正確。然一般坊間卻依楊英（？~1680）《從征實錄》記登陸日期為 4 月 1 日，按中西年曆對照表比對，應為 4 月 29 日。問題在清曆和明曆不同，明曆遲一日，為向達（1900~1966）、鄭鶴聲（1901~1989）所知，楊氏說法迄今卻仍不被普遍採用。[146]

緊接著的問題是，鄭成功在那裏登陸？他由《從征實錄》、《海上見聞錄》（阮旻錫〔1627~1715？〕）、《熱蘭遮城日記》、《熱蘭遮城決議錄》、《巴達維亞城日誌》證明在鹿耳門南岸北線尾島，[147]即今顯宮里鹿耳門媽祖廟附近。[148]這一說法被另一派以土城媽祖宮附近為登陸地點者反對，在地方形同水火，互相拼場，使歷史學家無端捲入風波。

做為日治時期研究臺灣史的先驅，他看不慣戰後一片仇日聲中，將臺灣史矮化為中國史下一個微不足道的分支，他追求歷史真相，實事求

145 楊雲萍，〈鄭成功的歷史地位——開創與恢復〉。

146 楊雲萍，〈鄭成功登陸臺灣的日期〉，《中國時報》，1979 年 4 月 24 日，副刊；〈鄭成功登陸臺灣的日期的問題——讀「學術的爭論」〉，《聯合報》，1961 年 5 月 10 日，副刊。

147 楊雲萍，〈鄭成功登陸鹿耳門港南岸北線尾島的資料〉，手稿本。

148 楊雲萍，〈訪楊雲萍談鄭成功登陸地點〉，收在漢聲雜誌社編，《古蹟之旅》（臺北：漢聲雜誌社，1981），下冊。他也為顯宮里里民立「鄭成功登陸地點紀念碑文」。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地做出反駁。楊氏在為陳漢光（1921~1973）寫的《臺灣抗日史》做序時，即道出他的看法：

> 夫臺灣非無史也，其燦爛與奇離，或並世界各處無其匹；只史書不多耳。[149]

他對於同僚方豪在〈日人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糾謬述例〉中「在此時期（按：即日治時代），一切臺灣研究與臺灣史即為日人所包辦」的說法，[150]頗不以為然，認為至少還有外國人在研究，如里斯的《臺灣島史》；甚至還有連雅堂、楊雲萍呢！

楊氏一直想把臺灣史的研究由臺灣風土研究的層次提高，需要達到學問的水準，不讓臺灣的研究成為好奇的對象，臺灣的研究亦即臺灣史的研究是專業的，不是隨便談談臺灣的風土人情就算是在研究臺灣史。他進一步提出，不要為了排他的、固陋的「鄉土」觀念，而使臺灣的研究變成無謂的歌頌，必須基於客觀的、冷靜的結論所到達的。換言之，他認為臺灣史研究不是自贊自畫，更不是抱殘守缺，反而要透過冷靜的研究，不自我膨脹，才算是真正的歷史。[151]

至於中文所載的「臺灣」一詞，以在那一本書出現為最早？楊氏認為是《隋書・流求傳》中所稱的流球即今之臺灣，此種說法在史學界也未成定論，但卻是楊教授的定見。[152]

（二）對臺灣人物的評價

楊氏對臺灣人物評價，有其獨特的看法，常一針見血，或微言大意，且能脫離一般寫人物傳的窠臼，提醒我們瞭解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才

149 1948 年 10 月 14 日撰。楊雲萍，〈序〉，陳漢光著，《臺灣抗日史》（臺北：守堅藏書室，1948）。

150 楊雲萍，〈日人的謬誤及其他——讀方杰人先生的大作〉，未刊稿（未完）。

151 亦即……，換言之……，為筆者的引申。林曙光，〈論臺灣風土的研究——致楊雲萍教授〉，《中華日報》，1948 年 7 月 21 日，副刊。

152 楊雲萍，〈臺灣史話〉，手稿本。此手稿可能是為某雜誌所寫，相當完整。其目次為一、「美麗之島」；二、荷蘭人的佔據；三、鄭成功的驅荷抗清；四、鄭經的經營；五、清朝治下；六、淪日五十一年到光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歷史的建構者，不當被忽略，而視其為「紀傳體」的遺毒。

當筆者要引領讀者進入楊氏《臺灣史上的人物》的世界時，想以林衡道（1915~1997）所著《臺灣一百位名人傳》做為對照組。

在行文方面，楊氏吝惜筆墨，且常剪裁原文，引經據典，最後三言兩語點出其重要性，令人回味無窮；林氏則因採口述紀錄的方式，因此敘事極為平實，較少徵引史料，但會將與該傳主有關的古蹟敘出，讓讀者可再進一步認識傳主。不過林書最大的問題在於充斥反共言論，令人不忍卒讀。[153]

對於貳臣，楊氏如何為其定傳？且舉施琅（1621~1696）、黃梧（？~1674）為例。黃梧降清，使鄭氏積存海澄縣的食糧盡失，打擊不可謂不大；又向清廷獻「滅賊（鄭）五策」，斷了鄭氏之援，這個計畫十分惡毒。楊氏曰：「滿清當局，最初也以為過於狠毒而踟躕不敢即付實行。可是，曲折之後，竟逐次實行，致使山東江浙閩粵五省的老百姓，人罹其害，鄭氏祖先墓塚中的枯骨，也不能安於地下；人怨鬼愁，黃梧之肉其足食乎！」[154]用辭極為嚴厲，為諸傳所無。林氏並未為黃梧做傳。

對於施琅，自來有些學者對其背叛鄭氏、又滅鄭氏而以道義相責，朱希祖（1879~1944）就在為《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之事》一書寫序時，認為旅琅平定臺灣是「行險徼幸」。楊氏則為其辯誣，認為施琅攻臺是出於深謀遠慮，是個知兵善戰、相當的人物，鄭氏「樓櫓旗幟陣伍之法」皆琅啟之。楊氏對施琅的說法完全不流於感情，只是他仍然在感情上討厭施琅，但又客觀認為行為的善惡和人的才幹能力不能相提並論。[155]換言之，他承認施琅的能力，但仍討厭他是個叛將。至於鄭氏另一大將劉

153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位名人傳》（臺北：正中書局，1984）。且看他的代序的第一段是怎麼寫的：「《臺灣一百位名人傳》是臺灣歷史上一百位名人的傳記，編寫目的在使讀者能從書中人物對臺灣的歷史有概略瞭解，知悉臺灣與大陸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也是針對共匪統戰工具——臺獨，最具體的答覆。……團結互助合作精神亦即為中華文化道統，這也是我們對於共匪階級鬥爭史觀最正面的反駁。」

154 楊雲萍，〈黃梧〉，《臺灣史上的人物》，30。

155 楊雲萍，〈施琅〉，《臺灣史上的人物》，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軒之投降清朝，卻無一語責之，[156]想是鄭氏王朝氣數已盡，國軒已撐到最後一刻，實屬不易。林氏的書中除上述沒有黃梧傳外，也沒有施琅、劉國軒的傳。

楊氏立傳於 1952 年，林氏口述於 1973 年，相差 21 年。林氏日本東北帝大經濟系畢業，亦堂堂一人物，又熟悉臺灣史事，斷無不為黃梧、施琅、劉國軒立傳之理。只是 1971 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又有人以鄭氏三世影射蔣家政權，而鄭經、蔣經國，名字都有「經」，為怕其中「悍將」向這三位學習投共去，因此就讓這三人蒸發於名人傳中。反觀楊氏恨惡分明，史筆公正，諸多啟發，優劣立判矣。

再來看楊氏對反清人物的描述。以朱一貴（1689~1721）而言，他反駁連橫將朱氏寫成鄭氏部將，質疑佈告不知其所據；[157]又說朱一貴抗清之初似無明確的意識和組織，意思就是暗示朱氏並非戰後通稱是反清復明的。[158]

對於林爽文（？~1788），楊氏則認為他反清的性質和朱一貴不同，因林等是極有「政治目的」的，想取清更而代之；又曾建元、封官，只因勝戰後「驕恣歡飲」，終至失敗。[159]文字雖未明言，似有可惜之意。

至於戴潮春（？~1864），楊氏認為他並沒有很強的叛清動機，有點莫名其妙，又不知不覺成為亂首，分封百官。又引連雅堂「戴潮春傳」來記戴氏放了殺淡水同知秋曰覲的貓阿鹿，認為他不忠於主人；但他卻也叛了清，又自解：「我之起事，徇眾意也，秋〔曰覲〕公有知，其能鑒我！」[160]這三位起事者，楊氏既未站在清廷官員的立場加以汙名，也未如中共史家將這三位都說成農民起義、造反有理，三個起事者的起事動機不同，但下場完全相同，亦保持史家冷靜的中立。

林氏之名人傳中，獨缺了反清的朱、林、戴三人，豈非偶然。

---

156 楊雲萍，〈劉國軒〉，《臺灣史上的人物》，46~48。

157 有關朱一貴討清檄文為連雅堂所代作，楊氏曾聽連震東告訴他，某晚其父告訴他，已幫朱一貴做了一篇檄文。

158 楊雲萍，〈朱一貴〉，《臺灣史上的人物》，81~83。

159 楊雲萍，〈林爽文〉，《臺灣史上的人物》，119~120。

160 楊雲萍，〈戴潮春〉，《臺灣史上的人物》，188~1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看抗日人物的傳，對目前評價跌停板的丘逢甲（1864~1912），楊氏指出呂氏後人（居今臺中縣神岡鄉三角仔）、連雅堂對丘逢甲有微辭，有其理由，但丘氏還是值得追念和永遠懷念，理由是他不得不走。丘氏也知將會受到指摘，離臺後的思臺化成的詩句：「其哀之切，其情之至，誰人能疑他而『投以石頭』呢！」何況他還留下不比黃遵憲（1848~1905）《人境廬詩草》差的《嶺雲海日樓詩鈔》。[161]對為抗日而死的吳湯興（？~1895），楊氏稱其「一木之支，對於將傾的大廈，或沒有如何作用，可是他們只有盡一切的努力以保衛家國」。[162]對吳彭年（1857~1895），則引《臺灣通史．彭年傳》：「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薄雲漢而竟日月。」[163]對於羅福星（1886~1914），楊氏只確認「這次革命運動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其餘均引日人所編《臺灣匪亂小史》。[164]對余清芳（1879~1916），楊氏指出余清芳抗日「檄文」，最值得注意，原因是余氏等人不僅反對日人，也反對滿清，而把臺灣淪日的責任歸給清廷；當把日人推翻後，要建立一個「大明夢想國」。由此可以看到鄭氏以來的「反清復明」的精神，也就是反抗日人的精神。[165]對林少貓（1865~1902），則是看重其被殺，標誌著日本人至此，表面上才將各處的抗日勢力平定，而平定的這天是1902 年 5 月 30 日，臺灣民主國至此才算滅亡。[166]

楊氏介紹的抗日人物僅有上述六位，但林氏書中共有 23 人，且在這些抗日英雄中穿插恨日、恨匪的敘述，有時令人難以消受。如楊再雲（一寫為楊載雲）傳中，林氏抨擊日人在鵝鑾鼻附近建立一座潮音寺，供奉在臺陣亡日軍的「英靈」。又指責日婦前田光枝幫助臺獨，企圖顛覆我政府的陰謀，「因為日本人念念不忘臺灣，所以共匪及其統戰工具『臺

161 楊雲萍，〈丘逢甲〉，《臺灣史上的人物》，252~255。
162 楊雲萍，〈吳湯興〉，《臺灣史上的人物》，261。
163 楊雲萍，〈吳彭年〉，《臺灣史上的人物》，264。
164 楊雲萍，〈羅福星〉，《臺灣史上的人物》，265~266。
165 楊雲萍，〈余清芳〉，《臺灣史上的人物》，269~270。
166 楊雲萍，〈林少貓〉，《臺灣史上的人物》，276~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獨』事事想利用日本人來遂行其陰謀」。[167]在林崑岡（1832~1895）[168]傳後也有一段批判臺獨的話，不贅。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楊氏為人立傳，除了引經據典糾正錯誤外，也對反抗體制人物給予一視同仁的介紹，評其時勢，說其背景，抓住一個人的神韻，給予恰當的評論；而林氏則以反日、反共、反臺獨為基調，雖內容亦有可觀之處，但神話、宣傳品的成分似乎高了些。當然，楊氏為這一百二十人立傳，也想為先人立傳，而得到他們的「道謝」。不知楊氏生前有沒有夢見他的傳主，真的因他們的魂歸來，而為之唱一曲「招魂之歌」！[169]

張炎憲教授對楊氏的論著有如下的美評：「擅長夾敘夾論，字數雖不多，卻以其詩人特有的敏銳、多情、憂思和憐憫，以身投影，感懷當代，更同情古人的際遇。楊教授常有神來之筆，一語點出微妙之處，而令人心儀，也許這正是詩人特具的風采吧！」[170]楊雲萍的人物研究實有如上的情形。

（三）留給臺灣史豐富的收藏

目前楊氏的收藏，圖書、歌仔冊、白話字書收在臺大圖書館，1941~1945 年（昭和 16~20 年）的私人信件，及皇民奉公會的相關公文、名人的筆迹，則大半藏於臺灣史研究所。臺史所已把相關的檔案掃描完成，存入楊雲萍資料庫中。以下分類說明楊雲萍的收藏（古文書和錢幣前面已做介紹，不贅）。

1. 羅馬白話字刊物

白話字是西洋傳教士為方便在閩南地區傳教，用羅馬字母拼寫出來的閩南語（亦稱臺灣話）、客家語，因為言文一致，可以用來教導不識

167 楊雲萍，〈楊載雲〉，《臺灣史上的人物》，301~303。
168 楊雲萍，〈林崑岡〉，《臺灣史上的人物》，311~312。
169 楊雲萍，〈序〉，《臺灣史上的人物》，4~5。
170 張炎憲，〈編後語——楊雲萍教授的詩情與歷史〉，《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822~8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文的民眾（包括婦女）瞭解教義及吸收新的知識。此一套書寫系統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先使用，他在麻六甲開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時，以方言羅馬字來幫助在南洋一帶的傳教士學習閩南方言。而在中國則自廈門開始推廣，並陸續編字典等工具書，如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廈英大辭典》、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廈門音的字典》。[171]甘為霖也寫過《廈門音新字典》，做為工具書。這是臺灣長老教會所使用的，不僅用在出版《府城教會報》（後改稱《臺灣教會公報》），也編出相關的宗教書籍、地理課本、幼稚園讀本、教會歷史等，甚至還利用這一套書寫系統來寫遊記；[172]或寫小說，如《出死線》、《阿娘的目屎》。[173]因此在臺灣文學史上，用羅馬白話字書寫的文章也應納入研究範圍。

臺灣文學館有鑒於此，曾委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呂興昌教授，發掘以白話字出版的書籍，當時本人也將楊雲萍收藏的 70 多本白話字書提供給該團隊。因為呂教授的團隊並沒有蒐羅客家語的書，而楊教授搜集的就有一、二十本，意義不可謂不大，如 *Chin-Tho Mun-tap*（《真道問答》客語版）。雖然這 70 多冊白話字書以宣揚基督教教義的居多，如 *Chin-tō-Būn-tap*（《真道問答》閩南語版）、*Kàu-hōe tián-lé*（《教會典禮》）、*Lô-má-jîn-su ê gián-kiú*（《羅馬人書的研究》）、*Thian-lō lék-thêng ê tāi-ì*（《天路歷程的大意》）等書；但也有和宗教關係較淺的，教導信徒、兒童的書。以下略述幾本，希望借此引起學者注意，利用這批重要史料。

171 張妙娟，《開啟心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臺南：人光出版社，2005），152~153。

172 陳清義，〈遊歷日本的紀錄〉，《臺南教會公報》（1903 年 1 月，臺南），5。

173 《出死線》為鄭溪泮牧師的著作，而《阿娘的目屎》（*A-niâⁿ ê bák sài*，母親的眼淚）是賴仁聲（賴鐵羊）牧師所寫。陳恩聰等撰，〈致力於教會自治運動的牧師——鄭溪泮牧師小傳〉，收入鄭仰恩主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臺灣教會人物檔案（一）》（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ák-Pah jī phian Lô-má jī chù-kái（《六百字編羅馬字註解》）[174]是一本日治時期用來教導會白話字而不會漢文者學習漢文的教材，由廉德烈（Andrew B. Nielson，1895~1928）編著，由淺入深，共教最基本的 600 字。《灌園先生日記》中就有利用該書的記載。[175]*Ióng-Sim Jū-Giân*（《養心諭言》），其實就是《伊索寓言》的白話字本作品，1931 年在廈門出版，共收 18 個小故事。[176]

Tē-Lí kàu-kho-su（koàn-sa^{n}、koàn-sì）（《地理教科書卷三、卷四》）沒有出版年代和日期。卷三介紹中國十八省，先介紹名山大澤，再分省介紹，先是直隸，依次是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四川、東三省（滿洲，分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選譯福建省的一小段做為參考：（不附原文）

> 這省地勢有山很多，武夷山在西北，第一有名，土地肥很適合出茶，海岸彎曲又有不少島嶼，所以行船要小心提防。天氣夏天熱，冬天稍為冷，霜雪少（頁 11）。

---

174 《六百字編羅馬字註解》，1925 年由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1932 年 8 月出第二版，書中只有六百字，每課十字，由淺到深，由漢文學羅馬字，或由羅馬字學漢文，都可利用。如第一課學的是六、上、中、下、山、水、土、大、小、人共十字。

17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3），196。林獻堂創的一新義塾，女子組以此為教科書，簡稱《六百字篇》。

176 “Beh chiū oē, m̄ chiū boē”（〈要就會，不要就不會〉）、“Tōa-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大石也要小石拱〉）、“Tî-hông ti^{n}-giân bit-gú”（〈提防甜言蜜語〉）、“Tham jī pîn jī khak”（〈貪字貧字殼〉）、“Ún-ok iông-siān”（〈隱惡揚善〉）、“Tiu^{n} lô-bōng tî^{n} tio̍h ka-kī ê kha”（〈張羅網纏到自己的腳〉）、“Lô-tek khah iâ^{n} chhiū”（〈蘆竹贏過樹〉）、“Chek-kok hông-ki”（〈積穀防飢〉）、“Ka-hô bān-sū sêng”（〈家和萬事成〉）、“Phiàn lâng chek phiàn kí, tò-tn̂g hāi ka-kī”（〈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Ti-tu peh-chiū^{n} thian-lô-pán”（〈蜘蛛爬上天羅板〉）、“Tāi-seng ê chòe lō-bé”（〈在前的反會在後〉）、“It pò hoân it pò”（〈一報還一報〉）、“Siang kha tah siang-chûn”（〈雙腳踏雙船〉）、“Lo̍k-tô khi chú-lâng”（〈駱駝欺主人〉）、“Hong jit to̍ béng”（〈風日門猛〉）、“Lé-to jîn-chà”（〈禮多人詐〉）、“Jiû lêng séng kong”（〈柔能勝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猜想卷一是日本，卷二是臺灣。

Loē-Hún（《內訓》）一書是廈門女子林溫碧霞所譯，大明仁孝皇后原著，1917 年 6 月出版，共 20 章。譯者認為，西風東漸，婦女漸學西洋，不守中國良好舊法，於婦德有虧，乃譯由明成祖皇后所寫的《內訓》，雖有小部分不合宜，卻希望能規範教會婦女。這本書譯成的背景，對研究婦女史的人一定有所幫助。

Sêng-Gú chi̍p（《成語集》）是廉德烈（A. B. Nielson）教士初學臺語時，其老師林祥雲所搜集的成語，共一百多句，一直未出版。當廉牧師要回英國時，有鑒於當時（1928）青年雖學會歐文（指英語）、和文（日文），但卻漸廢自己的俗語、成語，乃裒集成書，由臺南新樓書房印製出版。本書共有 111 句成語，列舉二句以概其餘：

Chit-lâng chú-tiu^{n}, m-tá̍t-tioh nn̄g-lâng su nīu

（一人主張，不如二人思量）（p.12）

Tâng gê-chô, thih chhùi-khí, sí ku chì^{n} kàu chîa^{n} oa̍h-pih

（銅牙槽，鐵喙齒，死龜辯到成活鱉）

Iú-tī khó-pún（《幼稚課本》），幼稚園用書，1920 年出版。本書描述仁德這個 5 歲的小可愛，陪祖母到阿公家的所見所聞，如幫母雞孵蛋不慎將蛋坐破，將小雞偷放入口袋；然後藉著小羊死亡，母羊尋子的悲傷，來讓仁德瞭解上帝的愛正如母羊。他以一張圖片勸他新交的朋友乖仔，接受耶蘇〔穌〕做為結尾。雖難脫宗教的味道，但讀來相當有趣。

Tiú^{n}-Ló-hōe ê lèk-sú（《長老會的歷史》），1927 年由新樓書房出版，編輯者是ダンカン・マクロード（Duncan Macleod，1872~1957），即劉忠堅牧師所編。旨在說明長老會形成的原因，其後復興、而後分派的狀況，及其分分合合原因；並介紹長老會的信經，說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展的狀況。其中已說到基督教的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177]

177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南：人光出版社，2003），193~4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臺灣歌謠（歌仔冊）

歌仔冊是用漢字寫、臺語唸的臺灣歌謠本子，也有人稱之歌仔簿，楊雲萍購藏 470 多冊。歌仔冊的內容以七字一句押韻，不拘句數而成，內容可小分為幾類：有的是民間故事或戲曲，如《最新玉堂春廟會歌》、《朱買臣迫寫離婚書》、《王昭君和番歌》（上）及（下）、《董二娘手指記情詩》、《廣增梁山伯與祝英臺新歌全傳》、《包公審尿壺歌》、《最新愛玉自歎孟姜女送寒衣》；也有勸世歌、相褒歌等，如《最新分開唱合相褒歌》、《格氣相褒歌》、《山狗狐狸勸世歌》；也有標榜新做的歌，如《勸世煙花女自嘆寓諷新歌》、《月臺美女新歌》、《戲情相褒新歌》、《排斥凍霜新歌》、《家庭必須要姻緣理想新歌》、《社會勸改棄邪歸正新歌》、《國語白話新歌》。

上述為描述人生悲歡離合及反映當時代的歌仔，但也有利用歌仔來教日文的，如《國語學習歌》：

> 日本ハリ講是針，番仔酒矸アキビン，ナキマメ土豆仁，イシヨイク是做陣，ワタクシ我本身，ニワトリ臺灣雞，アカクツ紅皮鞋，ヒトタサン人此多……。[178]

也有利用歌仔的形式，將日本教「忠」、「勇」的內容編入歌仔，如「肉彈三勇士歌」；[179]也有關於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旭某看博覽會新歌》，此歌有助於呂紹理教授研究臺灣博覽會的情況。[180]由此可見，楊雲萍的收藏多麼重要。

178 東方孝義，《臺灣習俗》（臺北：古亭書店，1974），170。

179 歌詞為「上海現時在戰爭，即在此歌有說明，每日聽見大銃聲，即隊前敵守備兵……」，詳見東方孝義，《臺灣習俗》，175。「肉彈三勇士」為戰爭時日本軍中美談之一。1932 年 2 月 22 日，上海事變日本第一次向廟行鎮的總攻擊之戰鬥中，有三個陸軍一等兵抱著中實炸彈的竹筒，衝向鐵絲網，就此爆死。陸軍發布此新聞，予以讚美，《朝日新聞》、《大阪每日》開始針對這三勇士的死亡來徵選歌曲、電影、歌舞伎，三勇士忠勇的氛圍於是形成，隨後也寫入教科書。但實際上這三人談不上「勇士」，乃因事故而死。佐佐木隆爾，《昭和史の事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95），82。

180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409~423。《旭某看博覽會新歌》共四集，發行人陳玉珍，嘉義市西門町的玉珍漢書部於 1936 年 2 月 22 日出版，亦即博覽會結束後 4 個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名人手迹（稿）與遺墨、名片

楊氏所藏名人手迹與遺墨，有伊能嘉矩寫給足立文太郎書信，是由宋文薰轉送；胡南溟（1869~1933）手稿（〈詩鐘〉）、連雅堂詩存〈苦雨〉；賴和（懶雲，1894~1943）遺墨；菊池寬（1888~1948）贈楊恭威、楊恭志（楊雲萍子）紙箋；郁達夫（1896~1945）贈楊雲萍墨迹（「化做春泥更護花」）；應社諸子陳虛谷（1896~1965）、楊笑儂（樹德）、吳蘅秋、楊守愚（1905~1959）、賴和酬贈之詩作。至於名片，有林茂生、沈媛璋、施江南（1902~1947）、謝東閔（1908~2001）、張邦傑、楊肇嘉（1892~1976）、韓逋仙、丘念台（1894~1967）、張錫祺、日下辰太、張冬芳、泉義夫、楊海盛、郭水潭（1908~1995）、林培英、施純綻、呂赫若（1914~1950）、柳宗悅（1889~1961）、徐慶鐘（1907~1996）、田中克己（1911~1992）、黃介騫、奧田彧（1893~？）、李添春（1898~1977）、顏水龍（1903~1997）、田井輝雄（戴炎輝）、伊藤金次郎（1892~1964）、古野清人（1899~1979）等。由這些名片可以看出楊雲萍早期交往人物之一斑。

4. 私人信函

楊雲萍刻意保存 1941~1945 年間來往的信函，不僅信封、信紙齊全，還分年用小麻繩綑綁。這些書信大約在楊氏去世後兩年才在宿舍（原來居住地）中某個櫥櫃深處找到，承楊家的信任，交由我來整理。這些書信包括幾部分：

一是《民俗臺灣》夥伴間為約稿、開會往來的信件，包括信函、明信片。[181]

二是《新建設》、《臺灣時報》、《臺灣新報》社、《興南新聞》社、《臺灣日日新報》社、啟文社、「臺灣」發行所、臺灣文庫刊行會、臺灣藝術社、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圖書館協會、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等單位邀請函，以及到館的新書目。

181 如金關丈夫有信函 14、明信片 9；立石鐵臣有信函 5、明信片 5；池田敏雄有信函 7、明信片 43；池田敏雄之妻池田鳳姿（黃鳳姿）明信片 2，即可略窺一斑。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情報部、情報課相關函件，有 22 件；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發出的有 14 件；臺灣文學奉公會發出的信函、開會通知明信片共有 17 件；《日本文學報國會》8 件；臺灣文藝家協會、臺灣演劇協會有 12 件；《文藝臺灣》社共有明信片 2 件；藝能文化研究會 2 件。上述這些通知函或明信片，都是 1941~1945 年間皇民奉公會相關文藝活動最珍貴的史料。有關皇民奉公會，目前因資料不足，僅有少數人投入研究，[182]如能善用這批資料，對戰爭期間皇民奉公會主導之臺北市文藝活動狀況，應能做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四是書店寄來的書單、書店發行的書誌，旨在提供楊雲萍購書的參考。如東都書籍株式會社（三省堂的子機構，在臺北設有支部）、萬伸社、生活社、日本古書通信社、思文閣、帝國大學新聞社、大屋書房、山本書店、松雲堂、盛興出版部、大陸書店、木內書店、昭和堂書店、ミササ屋書店、山口屋書店、古書明治堂、臺灣愛書會、古典社、臨川書店、ハレルヤ書店、時代ヤ書店、白雲堂、山田書房、玉英堂書店、竹中書店、幽學莊舍、三省堂、山一書房、北海出版社、清水書店。

另一為私人明信片。如與霧峰林家諸人的信件，就包括林幼春（字南強，1880~1939）明信片 3、林階堂（1884~1954）明信片 4、林資彬（1898~1946）明信片 2、林松齡明信片 1、林攀龍（1901~1983）明信片、書信各 1、林猶龍（1902~1955）明信片 1、林雲龍（1907~1959）明信片 3、林夔龍信函、明信片各 1、林瑞騰明信片 2、林涎生（六龍）明信片 2、呂靈石明信片 1。這些信不僅可以瞭解其購書習慣、私人交情，還能瞭解當時生活之一斑。

他留下來的〈昭和九年新十二月吉日友濂婚儀恭賀芳名簿〉，鉅細靡遺地登載來賀禮、送禮金的人之名單，以及物品、金額。而以其父楊

182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山水書房，1996），351~404；林蘭芳，〈日據末期臺灣「皇民奉公」運動，1941~1945〉，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　第三屆討論會——抗戰建國及臺灣光復》（臺北：國史館，1996），1193~1238；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期（1999，臺北），167~2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敦謨名義發出楊雲萍結婚典禮邀請函的回信明信片也都保留下來，格外有趣。如林獻堂由秘書溫成龍回信，他不能參加，不過送來 20 元禮金。當時大概很難有人如此細心地保留這些資料，除非如楊雲萍有保存史料的習慣者，另方面也顯示他對婚姻的珍重。

（四）擬訂《臺灣省通志》綱目

楊雲萍是《民俗臺灣》的大將，戰後他一再呼籲當局要奪回語言權，遂行歷史的接收，但語言權（臺語權）早已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設立下，毫無正當性；至於奪回歷史權，自以修一部綜合的臺灣史最為重要。他一再呼籲，未獲「接收」大員的理睬；提議編纂「臺灣史」，及早組織「臺灣史編纂委員會」，或是「調查會」，以遂行「不朽的事業」，[183]仍未獲青睞。二二八事件後，當局總算了解民眾的怨氣，為了稍紓遺老的鬱卒，先於 4 月 27 日任命林獻堂為臺灣省通志館館長，以做為象徵性的和解；其後，1948 年 6 月 1 日臺灣省通志館正式成立，[184]且將堂堂正正的「史」，改為地區的「志」。楊雲萍也因此以顧問的身分被林獻堂延攬為《臺灣省通志》綱目的擬訂者，他同時也是專任文獻委員。[185]

當時通志館有二層結構，一是通志館本身的人員，一是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6 月 14 日設），由黃純青（1875~1956）任主任委員，共同擔負編纂《臺灣省通志》的任務。1949 年 7 月 1 日，陳誠（1897~1965）繼任省主席，依法將臺灣省通志館改為省文獻會。[186]於是將這二層結構

183 楊雲萍，〈提議編纂「臺灣史」〉，《民報》，1945 年 12 月 13 日，社論。

184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07；楊雲萍在〈論方志的體例——從為臺灣省通志定體例說起〉（林本源文化基金會主辦第卅六次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也曾說：「謝東閔先生曾告訴我，要設一個通志館給林獻堂和其他老先生們，表示一種尊崇和安慰。這是站在政治的立場開設通志館的另一理由。」

185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9 年 6 月 21 日」，未刊稿。

186 先是林忠在 6 月 8 日決定擔任通志館副館長，他知道 1946 年政府已宣佈將各省通志館改為文獻會，臺灣省通志館應該更名。林忠，〈第八節出任臺灣省通志館副館長〉，《臺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臺北：皇極出版社，1987），67；林獻堂，〈灌園先生日

臺灣人文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而為一，林獻堂為首任主任委員，而將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黃純青命為副主任委員。

楊雲萍受命後，立刻到當時省立臺北圖書館看所藏的《臺灣通志》原稿。[187]該稿無標點，40 卷，分前、後兩半，前半部為疆域、物產、餉稅、職官、選舉、列傳，下半部為資料性質。這一部 1893 年開館修的《臺灣省通志》，由於原主纂的蔣師轍（1847~1904）「與某太府（指臺北知府陳文騄）議不合」而離去，[188]由薛紹元接手，迄 1895 年臺灣割讓，並未修成。據省文獻會第一任編輯組組長林熊祥（1896~1973）在本書影印本出版時所寫的序稱，通志的稿在臺灣割讓後，部分被攜回福州，1907 年事為日人知悉，乃由日本駐福州領事以銀 150 元買回，藏於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89]楊將該稿所有的綱目都抄錄下來，開始思考如何為臺灣戰後第一部臺灣通史訂體例。

1984 年 9 月 2 日，楊雲萍曾應林本源文化基金會之邀，擔任臺灣研究研討會的主講人，主講「論方志的體例——從臺灣省通志定體制說起」。當時他表示，在未接到林獻堂委託時，他「已經對過去的臺灣方志有過相當的關心。每一事都不是突然來的，研究臺灣的方志或修志也是如此。……當年定體例時，不僅參考了許多有關臺灣的資料，也注意到日本或德國等的編修地方誌的方法」。而在訂體例前，他認為有三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是臺灣該不該修通志。蔣夢麟（1886~1964）任浙大校長時，浙江要修方志，他表反對之意，認為通志的纂修（尤其體裁）不適合時代，要以專門的研究、調查報告和大事記等取代。楊則認為臺、浙不同，因為臺灣雖在光緒年間修通志，但沒有完成，日治五十年也沒編過，因此臺灣可以修；更何況當局設通志館主要是政治考量，且是對

記），「1948 年 7 月 6 日」，未刊稿。

187 按：省立臺北圖書館前身為日治時期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今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National Taiwan Library，擬改制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188 蔣國樑，〈跋〉，收在〔清〕蔣師轍，《臺遊日記》，臺灣銀行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

189 〔清〕薛紹元，〈弁言〉，《臺灣通志》，收入臺灣銀行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3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耆老的一種尊崇和安慰，就上述兩個因素看來是可以修的。

第二是對荷蘭人、日本人、「高山族」應該抱持何種態度？這是史觀、筆法所要面對的大問題。楊認為「必須要有歷史歸歷史，政治歸政治的態度」，同時他相信史家一定是「愛國家、愛民族的，一定會做很實在的處理」，必須相信歷史家。

第三個問題是對方志應該抱持何種看法？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將方志的價值提高到正史的地位，認為志即史，不與地理學相干；楊則認為志與史、正史不同，要以地理為主，志的研究就是要補充國史用的。[190]

釐清這三個問題後，楊氏在 1948 年 7 月 8 日後，以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擬就暫訂綱目，[191]並於 9 月 2 日召開臺灣省通志綱目審查會時提出，加以討論，連續開了一天沒有結論。[192]20 天後（9 月 22 日）再開一次會，決定文體採用蔣總統演講之語體文，至於修纂的下限到陳儀來臺接收為止，即 1945 年 10 月 24 日前。[193]翌日，館長林獻堂想要決定綱目，將協議的綱目 38 卷提交下午聯席會（即該館的會加顧問會），但會中仍有人反對楊所提之綱目，遂遭擱置，引起楊的不滿。[194]1948 年 6 月成立的省通志館過了 4 個月，仍在綱目未定、館刊未出，總編纂（魏道明擬聘徐炳昶）未來的狀況下，一直到 1950 年 9 月 23 日林獻堂離臺赴日止。[195]

林獻堂離臺後辭省文獻會主委，改由黃純青升任，林熊祥則由編纂組長升任文獻委員兼總編纂，[196]重用楊雲萍的林獻堂既已不在其位，楊

190 楊雲萍，〈論方志的體例——從為臺灣省通志定體例說起〉，第卅六次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灣風物》35 卷 1 期（1985）。

191 當時省通志館應有暫定的大綱七篇：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物、大事記，至是林獻堂要楊雲萍擬綱目。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 年 7 月 8 日」，未刊稿。

192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 年 9 月 2 日」，未刊稿。

193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 年 9 月 22 日」，未刊稿。

194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 年 9 月 23 日」，未刊稿。

195 9 月 5 日文獻會開會，綱目仍未定案，斷代則仍到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並買寶慶街的三層樓為會址。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9 年 9 月 5 日」，未刊稿。

196 陳漢光訪問，〈林熊祥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雲萍又已在臺大歷史系擁有教授之職，因此通志綱目的擬定就由林熊祥重新擬訂，綱目除卷首、卷尾外，共 11 卷，58 篇。[197]

《臺灣省通志》後來經過一番周折，在 1960 年才修完，[198]沒料到內政部審查委員卻以應當修到 1960 年為由，要求省文獻會增添史料加以補充，省文獻會不得不奉命再增修。於是增修以前的稿稱做《臺灣省通志稿》，增修的 25 冊油印增修通志稿於 1965 年完成。但不久即發現這兩套東西無法銜接，1966 年再成立通志稿整修小組，綜合折衷草擬綱目，予以統合。1973 年線裝的《臺灣省通志》正式出版，[199]離臺灣省通志館設置的 1948 年，前後經過 25 年。

（五）編輯《臺灣風物》

《臺灣風物》由陳漢光創辦，他是福建龍溪人，陸軍七十軍司令部機一連上尉；[200]退職後，進入板橋林家二房（林維源系），擔任林松壽獨子林子畏私人圖書室（守堅藏書室）主任。[201]他曾出版《臺灣抗日史》一書，請楊雲萍寫序，兩人因此結識。陳氏做事積極，擅於做田野工作，

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1），246。

197 林熊祥，〈臺灣修志的理論與實際〉，收入王國璠輯，《林文訪先生詩文集》（臺北：青文出版社，1982），82~85。

198 〈臺灣省通志〉到底修的斷代止於何時，原定到 1945 年 10 月 24 日，後決定修至 1950 年，即臺灣光復後五週年。據王世慶說，在時間已訂為 1950 年時，某一天文獻會接到來自省政府秘書處的電話，要求省文獻會把修志時間寫到 1946 年，亦即光復一週年即可，可能是為了避開 1947 年的陰影。但在 1960 年將修到 1946 年的臺灣通志交上去後，又被批以：「修志年代係以民國 39 年，光復五週年為斷代，但志稿中有的斷代及記載內容卻僅到民國 35 年，光復一週年止；又光復已逾 15 週年，臺省各項建設多在民國 39 年以後始著績效，本年為民國成立五十週年，臺灣通志應改為以五十年為斷代。顯然與目前史實脫節。」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113~114。

199 許雪姬等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114~116。

20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299。

201 許雪姬等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掘資料，他決定要創辦一個純粹由民間經營的雜誌，宗旨是「臺灣歷史、文化、風俗習慣闡揚研究」。[202]陳找到楊擔任主編的工作，可能是基於楊氏過去在文化工作上的成績以及研究的成果。

《臺灣風物》剛開始的撰稿者和主編、助編等大半是《民俗臺灣》的班底、撰稿者，可說傳承了戰前的《民俗臺灣》。刊名則受到陳奇祿為其主編的《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的啟發，而由楊命名為《臺灣風物》（*The Taiwan Folk-ways*）。這本新雜誌原來要在 1952 年 1 月出版，採月刊的形式，但因稿子已齊，而且陳漢光認為如果能在 1951 年 12 月出版，則 1952 年 1 月出的那一期就會是 2 卷 1 期，在楊贊同之下，乃在 1951 年 12 月出版。[203]

第 1 到 4 期，除第 2 期外，封面用圖都由楊氏提供，說明文也由他撰寫，用「羽青」為筆名，但這一筆名只用過 3 次。這一本雜誌可謂政府壓抑臺灣研究下，少數能長期出版的刊物，據說政府方面若有意見，則由陳漢光請人疏通，才得無事。[204]楊氏一直編到第 2 卷 8、9 期「女性風俗特輯」就不再編了。[205]他曾在 1953 年 12 月《風物》出版兩年後，應陳漢光之邀，撰寫一篇〈二週年紀念〉的短文，他自問《風物》之創刊對於臺灣的社會、學術界有沒有貢獻？答案他沒有明言，但他指出《臺灣風物》的功能純正且態度誠摯，而創刊當時也有些阻礙，「例如曾是我的學生張某的行動，使我太息」，[206]可見困難還是有，只是事過境遷，也早已是「去年之雪」了。此外《風物》未有固定的經費，料想主編費用也是半自助的（《風物》每本 3 元），因此主編無法長期任職。[207]

《風物》的楊主編，不想讓雜誌霑染「黃色」和內幕，而且限以臺灣為範圍，並以語體文發表「有關臺灣的歷史、地理、文藝、民俗、語

202 王詩琅，〈掙扎硬幹談「苦編」〉，《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981），21。

203 楊雲萍，〈《臺灣風物》創刊前後〉，《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3。

204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等，〈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本書即將出版，並訂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舉行新書發表會。

205 楊雲萍，〈《臺灣風物》創刊前後〉，《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6。

206 楊雲萍，〈二週年紀念〉，《臺灣風物》3 卷 5、6 期（1953）。

207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等，〈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言、宗教等的文字，研討直接、間接和臺灣有關之大陸內地的掌故，風俗等作品」。投稿者不少是《民俗臺灣》的作者，也有少數大陸來臺學者加入，[208]不到第 2 期已有要增刊的計畫。但是 2 卷 3 期《風物》突然刊登重要啟事，內容是該刊不再以商品出售，有需要者來函索取，且要審查合格始得贈送。[209]本期〈編後語〉指出是因《風物》未正式登記之故，因此不能如期刊出，已在趕辦登記中。[210]2 卷 6 期配合當局的「風俗改善」政策，而出《民俗改善問題特輯》，文中對 1952 年 8 月 22 日各報刊載「取締迎神賽會注意事項」十點中之三點表示意見；另方面提出三個問題來和讀者溝通，取得民意，[211]可能有藉著民意以降低當局「威壓風俗」之深意！讀者中有勞榦和莊松林（朱鋒）提出意見。楊雲萍也以兒子楊恭威的筆名「黃威」自問自答，認為當局訂的第三點「放水燈，照路燈，開關鬼門，栽燈篙，絕對禁止」，未盡妥善，該民俗沒有絕對禁止的必要，當局可再研究一下各種「行事」的內容和動機。對四個問題之一的第三點「民俗之陋者，固當予以取締或禁止，然一面多提唱〔倡〕更優之『行事』以代之，對此有何具體的高見？」答以「以各種運動競賽代之」；第四個問題「對民俗之研究或記錄採訪有何高見，有何期待？」答曰：「不消說，要加強民俗之研究與記錄，對於貴社，尤有深厚的期待。」[212]如此苦心孤詣地自問自答，以消極保存臺灣民俗為目的，對編者而言，比起日治時期，必更另有一番感慨。

2 卷第 7 期是歌謠特輯，楊以「本社同人」執筆，喚起整理歌謠必

208 如毛一波、屈萬里（翼鵬）、董作賓、石璋如、陳正希等人。毛一波，〈臺灣隨筆〉，《臺灣風物》2 卷 2 期（1952）；石璋如，〈楊梅的磚瓦業〉，《臺灣風物》2 卷 1 期（1952）；屈萬里，〈「偷青」和「摸秋」〉，《臺灣風物》2 卷 3 期（1952）；董作賓，〈福州歲時記〉、〈福州歲時記（續）〉，《臺灣風物》2 卷 2、3 期。

209 〈本社緊要啟事〉，《臺灣風物》2 卷 3 期，30。

210 〈編後記〉，《臺灣風物》2 卷 3 期，29。實則警備司令部來關切《臺灣風物》是在做什麼。

211 2 卷 6 期很薄，只有 13 頁。本社同人，〈關於民俗改善〉，《臺灣風物》2 卷 6 期（1952），2~3。

212 黃威（為楊雲萍子楊恭威筆名），〈關於民俗改善〉，《臺灣風物》2 卷 7 期（1952），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的共識，主張（1）未記錄的歌謠趕快記錄，以便保存；（2）已記錄的，當廣搜各種版本、抄本予以校勘；（3）評註特殊字句的意義和發音；（4）要正確記下舊譜。

第 8、9 期合刊是「女性風俗特輯」，但在第 7 期期末卻有下期要增設副刊「自由中國詩壇」，並聘請呂無畏主編的廣告，令人覺得發行人陳漢光是被迫容納此副刊。果真在 8、9 期合刊本就透露出楊雲萍不願身為主編卻不能左右副刊內容及另有主編的事實。[213]就我看，刊登的那些詩可能都達不到楊的高標準，楊不願自貶身價，與之附合。這詩壇主題居然是〈恭祝蔣總統六六華誕特輯〉，無關臺灣風俗民情，實不應刊。因此《自由中國詩壇》第一期是另外印製，但卻也寫為臺灣風物新誌副刊之一。此後，2 卷 10、11、12 期因故停頓，楊雲萍也不再主編；3 卷 1 期的社長、主編都由郭薰風擔任，且非正式鉛印，而是油印本。多少可看出《臺灣風物》面臨極大的壓力，不過這都和楊無關了。

由 1 卷 1 期至 2 卷 8、9 期合刊本，共 10 期刊物內容，與《民俗臺灣》有頗為類似之處，撰稿人重疊，前已述及，不贅。《民俗臺灣》與《臺灣風物》間確有傳承性，如雜誌做專號，或以地方為範圍，或以主題為探討的對象。僅舉一例，如《民俗臺灣》有立石鐵臣畫的插圖，膾炙人口，《臺灣風物》此期也有呂基正（1914~1990）以「新民俗圖譜」為名繪畫，可惜只畫了三期。1 卷 1 期畫的是「小吃店」，2 卷 1 期畫的是「喜春」，2 卷 2 期畫的是「偏街僻巷」，而這期的圖說是「羽青」（楊雲萍）寫的。呂基正是畫家、「青雲會」會長，臺灣省立博物館研究員。[214]

至於這兩年內，楊雲萍一共在《臺灣風物》貢獻不少文章，〈備忘小錄〉（一）、（二）、（三）、（四）談一些較為人疏忽的史實，並

213 《臺灣風物》2 卷 8、9 期謂：「漢光世兄：《自由中國詩壇》雖係我命名，足下為《臺灣風物》之屬，事亦良佳。至主編一事，貴刊自有其人，予自避匪來臺後，整理殘稿，自顧不遑，實無閒情與餘暇也，特復，仍希將去函照刊為荷　呂無畏十月廿二日。」《臺灣風物》2 卷 8、9 期（1952），30。

214 〈編後記〉，《臺灣風物》2 卷 3 期，29。此時的介紹為「臺灣省美術展免鑑查，臺陽美術協會會員」；楊雲萍，〈《臺灣風物》創刊前後〉，《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5。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些議論。如以費保彥（費行簡）著《四橋隨筆》中描述的邵友濂（？~1901），生性極為節儉，卻又不忘報恩的往事，楊氏因而認為邵是位篤厚的人物，但未必就是好政治家，因而中止了劉銘傳許多經營臺灣的新計畫、新事業。[215]自 2 卷 4 期起開始連載〈朝鮮顯宗實錄中有關南明史料〉，共四次，介紹用中文書寫的朝鮮史料中的南明記載，《朝鮮實錄》在當時來說，還很少人知道。還有以「羽青」為名撰的〈故事傳說在民間〉（1 卷 1 期），以及九期（《臺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另有以「本社同人」寫的〈關於民俗改善〉（2 卷 6 期）、〈臺灣歌謠的整理〉（2 卷 7 期）、〈女性與風俗〉（2 卷 8、9 期）。可說是既編又寫，此一現象也是他主編工作不能持久的原因。

在《臺灣風物》中，他也邀到一些好文章，只舉一例來說，即開始有了研究目錄的整理，如宋文薰〈鳥居龍藏有關臺灣著作目錄〉（2 卷 3 期），賴永祥與曹永和合編的《有關臺灣西文史料目錄稿》（一）、（二）、（三）、（四）（自 2 卷 4 期到 2 卷 8、9 期）介紹西文史料、日譯本等。就這方面來說《臺灣風物》也盡到為往後臺灣史奠定基礎的工作，而這也是楊雲萍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五、結論

楊雲萍教授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和第一代臺灣史家兼文學家的連雅堂一樣，文史兼備，能馳騁於兩界之間，互顯特色。「臺灣史」的發端應該在乙未之役臺灣遭到割讓之後，臺灣士子意識到從此隔絕兩岸的不僅是一彎海峽的水，更是一種政治的隔離。為了記下那些人為了臺灣而壯烈犧牲，那些人是腳底抹油的，因此如思痛子、吳德功、洪棄生都留下了當代的紀錄，成為往後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日治時期中葉，集臺灣史著作大成者是連雅堂的《臺灣通史》，氏所著雖然如同楊氏所批評，抄襲、創作、錯誤之處不少，但以臺灣為主體而寫的歷史，這是第

215 楊雲萍，〈備忘小錄（二）〉，《臺灣風物》2 卷 1 期，2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本，光是這點，連雅堂也可以永垂不朽了。

楊雲萍受過新教育，為文藝青年，看輕臺灣，但在林獻堂及莊垂勝（1897~1962）等人發聾振聵的點撥下，由文學漸漸走入史學之路；在日治時期即勤搜與臺灣有關的相關史料，研讀前賢、西人撰著過的臺灣史書；在報刊雜誌撰文，由民俗、文學乃至史學；在《民俗臺灣》發刊時，他正面攻擊該刊對臺灣風俗的看法呼應當局之不當，且以臺人的身分要日人作者說明「趣意書」中的疑點，也迫使日人不得不正視臺人在研究臺灣民俗中的角色和地位。他也是第一個在《臺灣日日新報》嗆聲臺北帝大要做「臺灣史研究」的第一人，並要求開「臺灣史」的課，但在日本統治期內他的願望沒有達成。

戰後他由一個職業作家、業餘學者投入新聞事業，執筆寫社論，在《民報》的第一號即討論要「紀念先烈」，為「匪徒」平反；接著要「文獻接收」、「奪還我們的語言」、「提議編纂『臺灣史』」；並督促改名的臺灣大學，要進行或完成若非臺灣大學就不能成就的業蹟和研究，比如高山族的語言、習慣，臺灣的歷史、文化，臺灣特有的動植物，臺灣特有的疾病，然而當局並未有立即的回應。

陳儀來臺設立臺灣省編譯館，以許壽裳為館長，許延攬楊出任臺灣研究組組長，就是肯定他過去的臺灣研究以及他對臺灣歷史研究的關懷。楊推薦三位日人學者合作，想將日人所留研究臺灣的業績加以整理、翻譯，同時要編印臺灣文獻目錄、臺灣研究叢書、臺灣昔時文獻、出版《臺灣學報》（原稱《東寧學報》），還要編著臺灣史、調查本省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這些雄心壯志，正待他去發揚奠基，可惜二二八事件發生，臺灣省編譯館終遭裁撤。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離開臺灣省編譯館後，得許壽裳之薦入臺灣大學，在歷史系任教授，也是第一位在臺大歷史系教臺灣史的人。

1947 年 9 月起到 1986 年 6 月，楊教授 80 歲不再教書為止，他在臺大整整教書四十年，在大學部開「臺灣史」課程，前後二十年，在博士班開了一學期的「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他所培養的學生，在目前臺灣史學界擁有一席之地者，舉凡黃富三、張炎憲、陳秋坤、林滿紅、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瑞明、許雪姬都是。[216]他在臺大教臺灣史的課，直到黃富三自英國留學返臺，於 1978 年接手；[217]而 1975 年，方豪也才在臺大歷史所碩士班開「臺灣史專題研究」，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楊教授是臺灣史界的唯一名門正派。

在他四十年的研究生命中，他對臺灣史的研究有以下的貢獻：

（一）完成《臺灣史上的人物》一書，突顯其臧否人物的功力，並且將政治與學術分開，將過去被稱為匪的抗清、抗日人物也寫入其中；對人物中的貳臣，也總站在時代的背景、個人的極限來評價，使往後研究臺灣人物者不能不參考。[218]

（二）對《臺灣通史》一書的研究後，將連雅堂視為第一代臺灣史家，得到史學界的認同，由於連對楊的新、舊學養敬重，楊也盡力為《臺灣通史》推銷。當《臺灣通史》有了「普世」的價值後，他開始指出《臺灣通史》一書中的限制，以免誤導世人，但又肯定這本書劃時代的意義。同時要人們記得一個貧寒交迫、擁有《臺灣通史》、《臺灣詩薈》的作者，僅以袒護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而為各界大力撻伐感到不平，表現出一個實事求是、又有同理心的史家品格。

（三）提出鮮明而正確的歷史觀點為後世所用。他不將鄭成功父子三代在臺事蹟全列入「南明史」的範圍，他指出南明史到桂王朱由榔於緬甸被執為止。鄭成功是「開臺」，不是「復臺」；登陸臺灣的日期是 4 月 30 日，而不是 4 月 29 日；登陸地點是靠近今顯宮里鹿耳門媽祖廟，而非土城。

---

216 林瑞明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而後到成大歷史系任教，改研究臺灣文學史。前面數位的碩士論文為楊教授指導，而許則是博士論文。

217 吳密察，〈歷史系的臺灣史課程設計——國立臺灣大學〉，發表於「臺灣史研究相關系所之現況與展望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6 年 12 月 15~17 日），2。

218 如本人撰寫柴大紀時，非參考楊師如何評論柴大紀不可。許雪姬，〈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故宮學術季刊》19 卷 1 期（2001，臺北）。又如潘是輝論及有關林豪的部分，也參閱《臺灣史上的人物》中的〈林豪〉。潘是輝，〈林豪編纂地方誌書的理念與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1、2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擔任第一任《臺灣風物》主編，延續日治後期《民俗臺灣》對臺灣民俗、文物的關心。他在編輯期間，既編又寫，也帶出他最重視的「研究目錄學」，在《朝鮮實錄》找到南明的相關資料，同時對當局民俗改革提出看法；也拒絕將《臺灣風物》變成傳統詩的園地，因此只編到 2 卷 8、9 期（也是該年最後一期）就離開主編的職位，但他所創下的宏規，仍被傳承迄今。

（五）呼籲纂修臺灣史，可惜功敗垂成。他是戰前唯一在報紙為文呼籲當局編纂臺灣史、進行臺灣研究者。戰後仍繼續鼓吹臺灣史的纂修，甚至將之列為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項目，可惜編譯館在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時被裁撤。

（六）訂定暫定《臺灣省通志》綱目，以備後人採擇：由於其對方志的深刻認識，又得到臺灣省通志館館長林獻堂倚重，因此《臺灣省通志》的綱目就由他來擬訂。他參酌過去的通志及日、德相關出版品，加以擬訂，雖然未獲全面採用，但已具體包含在林熊祥往後編訂的綱目中。

（七）收藏各種珍貴的史料，遺言將之捐給學術機關：楊雲萍生前即決定要將所有的圖書及收藏品捐給他服務四十年的臺大，他蒐藏的歌仔冊 470 多種、錢幣（以南明錢幣為主的珍品）、羅馬白話字的出版品 70 多種（有閩南、客家語）。與各界往來的書信則存於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尤其 1941~1945 年間，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發出的通知單、各大雜誌編輯部門的邀稿信函、參加大東亞文學會議的日記等，這些書信歷經臺北轟炸、二二八事件還能留存下來，可謂萬幸，也將是研究這段時期最重要的文獻。另外古文書、印章長期在《臺灣風物》連載，這又是另一值得一提的收藏品。

（八）於 1947 年開設臺灣史的課程，一直到 1971、1972 年才有淡江、師大歷史系跟進，[219]可說有二十多年時間獨挑大樑。使「臺灣史」脫離「鄉土」、「溢美」、「偏差」、「好奇」的層次，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而且在杏壇獨撐一、二十年才有後繼者，可說是延續「臺灣史」

219 吳密察，〈歷史系的臺灣史課程設計——國立臺灣大學〉，2，註 1。1971 年淡江大學由周宗賢開課，1972 年師大由王啟宗開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煙最重要的人物。

當然做為臺灣史的教學者和研究者，他不是毫無缺點，「楊教授不借閱任何資料」，在史學界早有流傳，就是我也從未向老師借過資料。當然也許有因為楊教授不出借資料，而使臺灣史研究未能更早獲得可觀的成果之虞；但從另方面想，如果他因出借資料而有所閃失，今日我們就很難看到他完整的收藏品。

其次，其學術論著均輕薄短小，且引經據典的篇幅頗多，不常一次刊完。關於這一點，他也有看法，當他在《中華日報》一日連載一篇傳時，他引芥川龍之介（1892~1927）對自己 Journalistic 的才能表示自嘲，楊卻認為這種才能沒「多大損害他的文學成就」，楊其實是以芥川龍之介自況的。[220]換言之，在有限的時間，連續的稿債壓力下擠出的作品不是差的，但是他的歷史文章，常令人感到意猶未盡。

楊雲萍畢竟沒能像他同年或後輩的研究者一樣，留下厚重的業績，如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陳紹馨《臺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遷》，甚至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也許有一部分是他非史學本科系畢業之故，但前三者亦無史學訓練背景。文學在筆者看來，是以極短的文字表達出最高的境界，文學作品制約了楊師的史學作品；而史學論著又抹殺了他文學創作的意願。戰後他只扮演文學界的「前輩」，不再是個文學創作者，並非無因。其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戰前他用日文寫作文學、史學，戰後他用中文寫作史學。1994 年有人訪問楊雲萍，何以詩集《山河》之後竟成絕響，他說：「一個寫作的人，必須不斷充實自己，多學古今中外，方可涉筆，此外尚需知音人，兩者缺一不可。」[221]

與楊雲萍同一時代的臺灣史研究者不少，有些僅限於「鄉土」層次，水準不高。在文獻會的委員雖有相當的論著，但不在學院，地位不如楊老，這也可能使他眼高手低；而他一入臺大即為教授，沒有升等的壓力，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還有就是缺乏知音，正如懷有絕技的武林高手一樣，

220 楊雲萍，〈自序〉，《臺灣史上的人物》，1。

221 自立晚報專訪，〈歷史學家　前輩詩人：楊雲萍　我的一生〉，《自立晚報》，1994 年 12 月 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眼看去，沒有敵手，只能品嚐寂寞的滋味。

楊雲萍於 1950 年於〈《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一文，提到林幼春（字南強）在《志略》的序文中寫道：「……回溯同人先後入社時，大都綠鬢青衫，曾幾何時，乃垂垂老矣。歲月不居而事功無見，百年後，寧復有過萊園而剔碑薙取櫟社沿革志略，而考其姓氏者耶！」[222]對此，楊氏有如下說法：

> 是的，百年後的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不過，〈題名碑記〉落成之三十年後，《沿革志略》刊行之二十年後，已有人取《櫟社沿革志略》，而談當時的事蹟了，雖然談的如是的簡略而固陋。南強先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223]

我也要如此地對楊老師說，在您逝世的 5 年半後，我為您寫了這篇不成熟的文章，老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魂兮歸來！

（責任編輯：查忻　陳志豪　校對：陳冠妃　陳巧宜）

222 楊雲萍所撰〈《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分四次刊登於〈臺灣風土〉第 90~93 期，1950 年 3 月 20、27 日及 4 月 3、10 日；引文出自 93 期（4 月 10 日）。

223 楊雲萍，〈《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臺灣風土〉93 期，1950 年 4 月 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報紙、雜誌（1960 年以前發行者）

《中國一周》（臺北），1952 年 5 月。
《中華日報》（臺北），1948 年 7 月 21 日~1952 年 7 月 22 日。
《公論報》（臺北），1948 年 9 月 14 日~1954 年 10 月。
《文藝臺灣》（臺北），1940 年 3 月~1943 年 9 月。
《民俗臺灣》（臺北），1941 年 5 月~1944 年 4 月。
《民報》（臺北），1945 年 10 月 10 日~1946 年 4 月 9 日。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臺北），1948 年 3 月。
《愛書》（臺北），1938 年 4 月 8 日。
《臺灣公論》（臺北），1943 年 5 月~1943 年 7 月。
《臺灣文化》（臺北），1946 年 9 月~1950 年 12 月。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 年 9 月 4 日~1941 年 8 月 24 日。
《臺灣風物》（臺北），1951 年 12 月~1986 年 6 月。
《臺灣時報》（臺北），1941 年 1 月~1942 年 5 月。
《臺灣新文學》（臺北），1937 年 5 月~1943 年 7 月。
《臺灣藝術》（臺北），1940 年 5 月。

二、史料文獻

〔清〕劉銘傳，《劉壯肅公（省三）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清〕蔣師轍，《臺遊日記》，收入臺灣銀行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7。
〔清〕薛紹元，《臺灣通志》，收入臺灣銀行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王詩琅，〈掙扎硬幹談「苦編」〉，《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981，臺北。
自立晚報專訪，〈歷史學家　前輩詩人：楊雲萍　我的一生〉，《自立晚報》，1994 年 12 月 5 日。
杜淑純，《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林　忠，《臺灣光復前後之回顧與自傳》。臺北：皇極出版社，1987。
林曙光，〈論臺灣風土的研究——致楊雲萍教授〉，《中華日報》，1948 年 7 月 21 日。
林獻堂著，〈灌園先生日記〉，1949 年，未刊稿。
范　泉，〈楊雲萍〉，《創世紀》。上海：寰星書店，19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曹永和，〈士林の古碑〉、〈士林の傳說〉、〈士林寺廟志〉、〈士林聽書〉，《民俗臺灣》，1 卷 6 號，總卷第 6 號，1941，臺北。
陳清義，〈遊歷日本的紀錄〉，《臺南教會公報》，1903，臺南。
陳漢光訪問，〈林熊祥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1。
黃富三，〈楊教授收藏——古錢幣、古印章〉，http://www.lib.ntu.edu.tw/manuscript/yangup/index.html.
楊雲萍，〈「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と其他〉，《臺灣新文學》（4、5 月號合刊本），2 卷 4 號，1937 年 5 月。
楊雲萍，〈一つの追憶〉，《愛書》，第 10 輯，1938，臺北。
楊雲萍，〈芝山巖考〉，《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4 月 13 日。
楊雲萍，〈臺大と臺灣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15~17 日。
楊雲萍，〈臺灣研究の碩學伊能嘉矩〉，《臺灣時報》，1941 年 1 月，臺北。
楊雲萍，〈研究と愛〉，《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5 月 29 日；同時載於《民俗臺灣》，1 卷 2 號，總卷第 2 號，1941，臺北。。
楊雲萍，〈民俗への愛〉，《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6 月 1 日。
楊雲萍，〈文脈と語氣　金關丈夫先生に答ふ〉，《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6 月 15 日。
楊雲萍，〈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続る論諍の始末（上）《民俗臺灣》發刊に際して〉，《民俗臺灣》，1 卷 2 號，總卷第 2 號，1941，臺北。
楊雲萍，〈士林文化展出品の臺灣研究必讀十書〉，《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24 日。
楊雲萍，〈研究と對象〉，《民俗臺灣》1 卷 6 號，「士林特輯號」，總卷第 6 號，1941。
楊雲萍，〈「劍花室文集」に就て（連雅堂の遺墨）〉，《臺灣時報》，第 268 號，1942 年 4 月 15 日，臺北。
楊雲萍，〈紀念先烈〉，《民報》，1945 年 10 月 10 日。
楊雲萍，〈文獻的接收〉，《民報》，1945 年 10 月 14~16 日。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上）、（下），《民報》，1945 年 10 月 22、23 日。
楊雲萍，〈光復與「復古」〉，《民報》，1945 年 10 月 27 日。
楊雲萍，〈學術與國界〉，《民報》，1945 年 11 月 26 日。
楊雲萍，〈我們的「等路」臺灣的文藝與學術〉，《民報》，1945 年 12 月 2、3 日。
楊雲萍，〈提議編纂「臺灣史」〉，《民報》，1945 年 12 月 13 日。
楊雲萍，〈一個誤會〉，《民報》，1945 年 12 月 25 日。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創刊號，1946，臺北。
楊雲萍，〈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1946 年 2 月 3 日。
楊雲萍，〈印刷與文化〉，《民報》，1946 年 4 月 9 日。
楊雲萍，〈中山詩文集及其他〉，《民報》，1946 年 5 月 19 日。
楊雲萍，〈文藝家在那裏〉，《民報》，1946 年 11 月 2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雲萍，〈信賴民眾？〉，《民報》，1946 年 12 月 29 日。
楊雲萍，〈希望屬於我們〉，《民報》，1947 年 1 月 4 日。
楊雲萍，〈憲法公布後應有的作風〉，《民報》，1947 年 1 月 11 日。
楊雲萍，〈「劉銘傳紀念館」那裏去？〉，《臺灣文化》，3 卷 8 期，1948，臺北。
楊雲萍，〈序〉，陳漢光，《臺灣抗日史》。臺北：守堅藏書室，1948。
楊雲萍，〈「臺灣文化志」的著者〉，《公論報》，第 19 期，1948 年 9 月 14 日，臺北。
楊雲萍，〈關於黃景寅的詩〉，《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44 期，1949 年 4 月 3 日，臺北。
楊雲萍，〈關於黃景寅的詩（續）〉，《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45 期，1949 年 4 月 13 日，臺北。
楊雲萍，〈臺灣研究必讀書十本（1）「臺灣通史」〉，《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51 期，1949 年 5 月 24 日，臺北。
楊雲萍，〈《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臺灣風土〉第 90~93 期，1950 年 3 月 20、27 日；4 月 3、10 日。
楊雲萍，〈「澎湖遊草」及其他〉，《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106 期、107 期，1950 年 7 月 24、31 日，臺北。
楊雲萍，〈輓傅（斯年）校長聯〉，《公論報》，「日月潭」862 期，1950 年 12 月 31 日，臺北。
楊雲萍，〈滄海遺民王友竹〉，《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127 期，1951 年 1 月 26 日，臺北。
楊雲萍，〈吳鳳事蹟與一英人〉，《公論報》，第 133 期，1951 年 4 月 20 日，臺北。
楊雲萍，〈吳鳳碑記及其他〉，《公論報》，第 134 期，1951 年 5 月 4 日，臺北。
楊雲萍，〈備忘小錄（二）〉，《臺灣風物》，2 卷 1 期，1952，臺北。
楊雲萍，〈詩人連雅堂〉，《中國一週》，109 期，1952，臺北。
楊雲萍，〈二週年紀念〉，《臺灣風物》，3 卷 5、6 期，1953 年 12 月 1 日，臺北。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臺北文物》，3 卷 2 期，1954，臺北。
楊雲萍，〈陸隴〔壠〕其與臺灣〉，《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158 期，1954 年 2 月 1 日，臺北。
楊雲萍，〈連雅堂與圓山貝塚〉，《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165 期，1954 年 3 月 22 日，臺北。
楊雲萍，〈沈傲樵的遊臺詩篇〉，《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181 輯，1954 年 7 月 19 日，臺北。
楊雲萍，〈大直徐氏番祖媽〉，《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 187 期，1954，臺北。
楊雲萍，〈連雅堂傳〉，收入林熊祥等撰，《臺灣文化論集》，第 2 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楊雲萍，〈有關臺北市的二三古文書〉，《臺北文物》，5 卷 1 期，1956，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雲萍，〈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資料〉，《臺北縣文獻叢輯》，二輯。臺北：臺北縣文獻會，1956。
楊雲萍，〈越南錢幣與中國〉，收在郭廷以等撰，《中越文化論集》，第 2 冊。臺北：中華文化，1956。
楊雲萍，〈陳登元的事蹟及其遺作〉，《臺北縣文獻叢輯》，2 輯。1956，臺北。
楊雲萍，〈明國子監考〉，收入李宗侗等撰，《中國歷代大學史》。臺北：中華文化，1958。
楊雲萍，〈楊爾康先生遺著〉，《臺灣風物》，4 卷 5 期，1959，臺北。
楊雲萍，〈鄭成功登陸臺灣的日期的問題——讀「學術的爭論」〉，《聯合報》，1961 年 5 月 10 日。
楊雲萍，〈石暘睢先生的追憶〉，《南瀛文獻》，10 期，1965，臺北。
楊雲萍，〈胡適之先生的追憶〉，《中國時報》，1973 年 12 月 17 日。
楊雲萍，〈明熹宗朱由校試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4 期，1977，臺北。
楊雲萍，〈記新得南明錢幣〉，《錢幣天地》，2 卷 1 期，1978，臺北。
楊雲萍，〈鄭成功登陸臺灣的日期〉，《中國時報》，1979 年 4 月 24 日。
楊雲萍，〈南明時代的錢幣〉，《歷史博物館館刊》，10 期，1979，臺北。
楊雲萍，〈崇禎監五錢小記〉，《集幣會刊》，2 期，1980，臺北。
楊雲萍，〈訪楊雲萍談鄭成功登陸地點〉，收在漢聲雜誌社編，《古蹟之旅》，下冊。臺北：漢聲雜誌社，1981。
楊雲萍，〈方杰人先生安息〉，《臺灣風物》，31 卷 1 期，1981，臺北。
楊雲萍，〈永昌當五錢試考〉，《集幣會刊》，3 期，1981，臺北。
楊雲萍，《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
楊雲萍，〈池田敏雄先生逝世紀念專輯〉，《臺灣風物》，31 卷 2 期，1981，臺北。
楊雲萍，〈金関丈夫先生の思い出〉，《えとのす》，12 號，1983，東京。
楊雲萍，〈許季茀先生的追憶〉，《書和人》，426 期，1981，臺北。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 卷 4 期，1981，臺北。
楊雲萍，〈《臺灣風物》創刊前後〉，《臺灣風物》，31 卷 4 期，1981，臺北。
楊雲萍，〈生肖八卦錢譜初稿〉，《集幣會刊》，6 期，1984，臺北。
楊雲萍，〈古語錢小譜〉，《臺灣風物》，34 卷 3 期，1984，臺北。
楊雲萍，〈王詩琅先生追憶〉、〈論方志的體例——從為臺灣省通志定體例說起〉，《臺灣風物》，35 卷 1 期，1985，臺北。
楊雲萍，〈生肖八卦錢譜續稿〉，《集幣會刊》，7 期，1985，臺北。
楊雲萍，〈記新獲「西王賞功」幣〉，《集幣會刊》，8 期，1986，臺北。
楊雲萍，〈悼林柏壽先生〉，《臺灣風物》，36 卷 2 期，1986，臺北。
楊雲萍，〈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1977 年 4 月 10 日的演講，收入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臺灣》，上冊。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88。
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雲萍藏，張炎憲、曾品滄編，《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臺北縣：國史館，2003。
楊雲萍，〈鄭成功登陸鹿耳門港南岸北線尾島的資料〉，手稿本。
楊雲萍，〈日人的謬誤及其他——讀方杰人先生的大作〉，未刊稿（未完）。
臺大同學會編印，《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同學會，195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
潘迺禎，〈士林市場について〉、〈士林歲時記〉、〈內山雛鼓に就て〉，皆收入《民俗臺灣》，1卷6號，總卷第6號，1941，臺北。
〔英〕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臺南：自刊本，1913一版；1933四版。
〔日〕三島格，〈士林雜記〉，《民俗臺灣》，1卷6號，總卷第6號，1941，臺北。
〔日〕井川直衛，《バアクレイ博士の面影》。臺南：基督教真理社，1936。
〔日〕北岡政子、秦賢次、黃英哲等編，《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93。
〔日〕石原靜三，〈芝山巖移轉當時に於ける學務部の情況〉，《民俗臺灣》，1卷6號，總卷第6號，1941，臺北。
〔日〕立石鐵臣，〈士林の月〉，《民俗臺灣》，1卷6號，總卷第6號，1941，臺北。
〔日〕金關丈夫，〈士林刀〉，《民俗臺灣》，1卷6號，總卷第6號，1941，臺北。
〔日〕持田辰郎，《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史》。臺北：東都書籍臺北支店，1946。

三、近人研究

尹章義，〈臺北平原拓墾史研究（1697~1772）〉，收入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方　豪，〈陳第《東番記》考證〉，《臺大文史哲學報》，7期，1956，臺北；後收入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方豪自印，1969。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報紙之保存現況與史料價值〉，《臺灣史料研究》8，1996，臺北。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入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吳密察，〈歷史系的臺灣史課程設計——國立臺灣大學〉，發表於「臺灣史研究相關系所之現況與展望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6年12月15~17日。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南：人光出版社，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2。
林瑞明，〈《山河》初探：楊雲萍詩論之一〉，收入氏著，《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臺北：允晨文化，1996。
林瑞明主持、許雪姬協同主持，〈《楊雲萍全集》整理編輯計劃期末報告書〉。臺北：未刊稿，2001。
林瑞明，〈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發表於「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學術研討會」。臺北：國史館，2001；後刊於《文學臺灣》45 期，2003，高雄。
林熊祥，〈臺灣修志的理論與實際〉，收入王國璠輯，《林文訪先生詩文集》。臺北：青文出版社，1982。
林蘭芳，〈日據末期臺灣「皇民奉公」運動，1941~1945〉，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　第三屆討論會——抗戰建國及臺灣光復》。臺北：國史館，1996。
張世賢，《晚清治臺政策》。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張妙娟，《開啟心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臺南：人光出版社，2005。
張炎憲，〈編後語——楊雲萍教授的詩情與歷史〉，收在楊雲萍著，張炎憲編，《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
張崇根，〈周嬰《東番記》考證〉，《臺灣歷史與高山族文化》。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期，1999，臺北。
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李東華編，《方豪先生年譜》。新店：國史館，2001。
許雪姬，〈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故宮學術季刊》，19 卷 1 期，2001，臺北。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楹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訪問，《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卷 1 期，2006，臺北。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1 版 4 刷。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 期，2006，中壢。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等，〈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未刊稿。（即將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出版）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
陳思聰等撰，〈致力於教會自治運動的牧師——鄭溪泮牧師小傳〉，收入鄭仰恩主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臺灣教會人物檔案（一）》。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
陳速換，〈久保天隨《澎湖遊草》之語言風格探討（上）〉，《硓𥑮石》，43 期，2006，澎湖。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逯耀東，〈懷念楊雲萍先生　那棵孤佇的檳榔樹〉，《中國時報》，2000 年 8 月 16 日。
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東京：創土社，1999。
楊　熙，《清代臺灣：政策與社會變遷》。臺北：天工出版社，1983。
葉石濤，〈楊雲萍與《人人雜誌》〉，收入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著，《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潘是輝，〈林豪編纂地方誌書的理念與實踐〉。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日〕河原功，〈三省堂と臺灣——戰前期の臺灣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流通〉、〈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皆收入氏著，《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
〔日〕近藤正己，《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山水書房，1996。
〔日〕佐佐木隆爾，《昭和史の事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95。
〔日〕東方孝義，《臺灣習俗》。臺北：古亭書店，1974。
〔韓〕朴光賢，〈京城帝國大學と「朝鮮學」〉。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人間情報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2。
〔韓〕鄭圭永，〈京城帝國大學に見る——戰前日本の高等教育と國家〉。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ofessor Yang Yun-ping and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Hsu, Hsueh-chi*

Abstract

Professor Yang Yun-ping (1906~2000) taught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TU for 40 years, and was the first to deliver a Taiwan history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after retrocession. Though he was fond of literature and did not have a backgroun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e inherited Lien Heng's (連橫) and Lin Hsien-t'ang's (林獻堂) historiography. He illuminated the climate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before and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His conversion was according to the shift of the times.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was under a wartime system. Though in the border area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t had to support the war effort, even to become a battlefront. As a Taiwanese, Professor Yang could neither not assist in the war effort affirmatively, nor oppose the war directly. The only way for him was to be steeped i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Moreover, he wrote an article in the *Taiwan Daily News* (《臺灣日日新報》) to appeal to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o enhance Taiwan resear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journalism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He commented on current affairs, appealed to recapture our own language and stepped in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iwan history actively. In the meantime, he held the post of Senior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t the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ng of Taiwan Province. After the 228 incident, the institute was closed, and he became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TU. He taught courses on South Ming History, Taiwan History, Selected Japanese Readings in Taiwan History. He supervised graduate students to write master theses and doctorial dissertations, too.

*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nd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 masterpieces include: *Taiwan Historical Personages* (《臺灣史上的人物》), *Studies in South Ming History and Taiwan Culture* (《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 He studied the poems and biographies of classical poets, and commented on historical characters objectively. This was the precious heritage he left for the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Yang Yun-ping (楊雲萍),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TU, the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ng of Taiwan Province, Taiwan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